

昆仑堂

二〇一五年
第一期
(总第四十一期)
昆仑堂美术馆主办

封面题字: 朱福元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昇嘉 刘 墨

杨守松 杨 新

陆家衡 单国霖

夏天星 萧 平

鲁 力 薛永年

主 编: 俞建良

执行主编: 陆昱华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沈 江 陆昱华

俞亚琴 俞建良

顾 工 蒋志坚

地 址: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中路
109号

电 话: 0512-57366892

传 真: 0512-57366893

网 址: www.kltartgallery.com

E-mail : ksklt@ksklt.com

邮 编: 215301

准印证号: JSE-005735

版面设计: 昆山亭林制版印务
本刊图文 未经同意 不得转载

目 录

馆藏精品赏析

昆仑堂美术馆藏无款画研究(一) 俞建良 2

人物研究

查士标眼中的汪之瑞及其绘画 任军伟 9

文彭年表(四) 刘东芹 15

胡石予先生年谱 马一平 21

书画研究

记顾翼东旧藏《王同愈诗书卷》 李 军 37

读《味水轩日记校注》札记 陆平泉 44

昆山片玉

方还撰书的《巴城福星桥记》 郭志昌 47

艺苑零拾

《瓿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作者之证 申 闻 48

昆仑堂美术馆藏无款画研究(一)

□ 俞建良

无款画,亦称“佚名画”,或谓“无名氏画”,即不知作品的作者为谁。在传世的无款作品中,有的是独立完成而没有署名,或虑及作品的完整性而没法署名,有的是多人合作,或当时有署名,后经时代变迁已毁等因素。

笔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潜心研究发现,无款画的起源历史久远,若从专家、学者认定的“人类文明起源”开始,即良渚文化,距今已有 5200 年的历史。本文所记无款画研究,侧重于中国画。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独树一帜。应当指出,中国画形成前的早期绘画作品,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一般都不署作者的姓名。先秦、春秋战国,至西汉的绘画作品,形式多样,如彩陶、壁画、帛画,以及漆画、画像砖等等。这些作品,均为无款,也足以让人们叹为观止。如“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赵陵山遗址出土的源极图,它留给人们的是深刻启示。源极图不是一般的图案,它是抽象的,无始无终而生生不息;它点燃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一道曙光,文明之路由此启航。此图出土鉴定为赵陵山宗族的“族徽”,称之为“源极图”,在逻辑构造上,胜过“太极图”。源极图是文明起源的象征,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源极图质地为细泥灰陶盖,敞口圆底,口径 9.3cm,高 3cm,表面磨光后细心刻

上图案。已故著名画家董欣宾先生的长篇文章《论赵陵山源极图》,从绘画的多种角度进行论述,轰动学术界和艺术界。诚然,如陶画、帛画、漆画、以及砖画等图案中,能去研究它的艺术价值、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包括独特的生存方式,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文化艺术的核心部分,已有专家学者专论,但均找不到这些无款画的作者,这里不再论述。本文的侧重点是以无款中国画为主要研究对象。无款中国画在历代收藏、鉴定家的论画笔记中时有谈及,但至今还未见专著、专论。

据笔者考,有款中国画从东汉、东晋开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直至宋、元、明、清,画家人数随时代发展亦递增。但由于历史变迁、自然灾害等,出现的种种原因,以及画家自身作为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而没有署名的作品大量并存,虽然有很多传世作品,后人已定在某画家名下,但还是可以斟酌。由于研究条件有限,笔者就昆仑堂美术馆所藏无款中国画十八帧,按时代划分作一研究。

一、《传徐熙春燕戏花图》

《传徐熙春燕戏花图》,绢本,纵 102 厘米、横 32.5 厘米,无款。是图上有清代“江上外史”笪重光的题词,其考证为五代时期著名花鸟画

家徐熙所作。徐熙,五代南唐杰出画家,南京人,一作钟陵(今江西南昌)人。出身江南显族,世代为官,但徐熙却未当官,布衣终生。其性情豪爽旷达,志节高迈,善画花竹、林木,蝉蝶、草虫等,妙写自然。徐熙画花,落笔颇重,只要略施丹粉,骨气过人,生意跃然纸上。其作品有“意出古人之外”,而创立了“清新洒脱”的风格。可谓“骨气风神,为古今绝笔”。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对徐熙的画也是大加赞赏。此幅绢本设色,徐熙通过巧妙布景,设色细致,笔法工整。杨新、薛永年两位先生观后考云:“画牡丹、梨花、杏花及双燕,绢面残破,画法古朴。原裱边有笪重光题‘徐熙春燕戏花图’,是笪氏推测,不足为凭。但从画风判断,仍到北宋,原应为屏风画。因破损而被裁割,上有张远题跋,及罗振玉观款皆真。值得珍重、研究。”

《传徐熙春燕戏花图》书堂有清初康熙时书画家、鉴藏家笪重光“徐钟陵春燕戏花图”题首,及张远、罗振玉跋,并有黄绍宪的收藏印。张远字超然,康熙三十八年(1699)解元,书画皆工。从题跋中可知,此图原为笪重光家所藏。或因喜欢,张远忍痛将自己收藏苏东坡墨竹与此相换。可见张氏对此图之厚爱。跋语中有“虽然数百年而神理粉色皆完好。绢稍斑驳,所谓徐熙绢如布,良然”之语。杨新、薛永年鉴定家通过显微镜可看到,绢之质地确实非常粗糙。故杨、薛两专家考证,此图虽不能断定为徐熙所作,而根据画风和绢质、墨色、时间,不晚于北宋年间。画上题首者笪重光(1623-1692),字在辛,号君宜、江上外史,江苏省句容人。顺治九年进士,官御史,巡按江西,以劾明珠去官。罢官归乡,隐居茅山之麓,学导引,读丹书,潜心于道教。卒年七十。笪重光工书善画,与姜宸英、汪士鋐、何焯称四大家。精古文辞。有《书筏》、《画筌》二书传世。昆仑堂美术馆还藏有笪重光小楷《嘉州集》一册,录五言律二十四首,其字形宽展,捺画闲闲逸出,颇见雅意。笪重光

的小楷书传世极少,此册为传世精品。

再观笪重光“徐熙春燕戏花图”所题,定为五代徐熙所作,尚有争议。另有罗振玉题观款,黄绍宪收藏印,罗振玉(1866-1940)。是晚清民国著名学者,还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可称之为鉴藏大家。黄绍宪广州人。字季度,光绪十七年举人,工诗画,富收藏。有《在山草堂烬徐稿》、《在山草堂烬徐稿余诗》十四卷传于世。

以笔者之见,《春燕戏花图》其画风似五代徐熙,所绘是两朵盛开牡丹,数株梨花,一燕栖息于花枝上,另一燕穿梭于花丛间,春意盎然。虽然年代久远,而图案生动,随类赋彩,清晰可见。其用笔自然,用墨、用色古厚拙朴,满纸点染,不留隙地,与徐熙画法相类。唯徐熙传世作品极少,传为徐熙作品有《雪竹图》(上海博物馆藏)和《玉堂富贵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时机比较后再作探讨。

研究传统的花鸟画,宋、元是座高峰,就其绘画风格而言,既有传承因素,又有创新之举。宋画重写实,再现与造化眼中所见,或绘生活长景、田野风光,或一草一木、一鱼一鸟。五代至宋人所画《牡丹图》,形体生动而自然,用笔工细。虽设色妍丽,而清新文雅,形神兼备。

牡丹是富贵之象征,是花中之王。自唐代以来,牡丹无论宫廷,还是民间,人人喜爱。画家常常画牡丹与小鸟连在一起,称之为“玉堂富贵”。历代花鸟画家当首推徐熙、黄筌二人,一在南唐、一在后蜀。徐熙画牡丹以写生为主,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徐熙因未当过官,故一生致力于绘画。其风格没骨渍染,轻淡野逸而质朴简练,世有“下笔成珍,挥毫可范”之说。其时黄筌主持宫廷画院,曾斥徐熙为“粗恶不入格”,不得徐熙入画院。到了宋朝时,徐画大受人们的赞赏。宋太祖及书法家米芾均有评价:“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黄筌惟莲差胜,虽富艳皆俗。”后蜀黄筌之画,用色艳丽,大有富贵

气象。比之徐熙“水墨淡彩”给人以超逸清雅之感。后世对徐熙与黄筌俩人的绘画风格，称之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二、《柱石苍鹰图》

《柱石苍鹰图》，纸本，纵102厘米、横41厘米，无款。杨新先生鉴定云：“《柱石苍鹰图》，纯用水墨，鹰造型准确，身体修长。本幅上方最早题诗者为戴珊，字廷珍，为天顺甲申（1464）进士。主要活动在成化间，比林良供奉内廷要早，从这一点考虑，此画应到元朝，而且画手水平较高。”

古代鹰称鹏，其嘴弯曲而锐，四趾具钩爪，侧目而视，号为苍鹰。其性猛，以小型鸟类及兽类为食，飞行双翅宽阔，栖息于不同海拔高度的针叶林、混交林和阔叶林等森林地带，也见于山地平原、或海边和丘陵地带的疏林和小块林内。视觉敏锐，善于飞翔。性甚机警，亦善隐藏。由于苍鹰卓越的生存能力及拼搏精神，一直为历代画家喜画之。苍鹰一般单独活动，故画家笔下往往是独鹰。唐代诗人杜甫早年有一首画鹰题画诗云：“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耸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镞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此诗笔触细腻、传神，传达出作者对所处时代的不幸。诗人通过画面腾起一片风霜肃杀之气，体现出苍鹰之威猛，栩栩如生。诗不仅章法谨严，而且形象生动。

自古以来，鹰是中国画中的重要题材。据笔者初考，画鹰唐代初创，基本格调是设色工笔写生。五代黄筌、徐熙已趋向成熟。特别是黄筌父子的工笔重彩，在宋初宫廷画院被奉为楷模，达百年之久。北宋中期崔白是杰出的花鸟画家，其作品是融洽五代而又在自己独特的写生基础上概括，生动活泼、画风清澹。特别是花鸟翎毛精妙绝伦，数百年来颇为推崇。早期画鹰有影响的当是宋徽宗赵佶。赵佶是中国绘画史上承前启后，开新一代画风的关键性人物，

其笔下的鹰，气势磅礴，气韵生动。史料中早有“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之说。宋徽宗赵佶画鹰，九百年来，历朝历代均有相同题材作品传世。《御鹰图》世传本甚多，同时有《白鹰图》、《松鹰图》等，应为同一系列赵佶笔下之鹰。李迪是两宋之间的花鸟画家代表，其表现手法多样，既保留了北宋绘画传统，又在技艺上变化，具有时代风貌，并有趣味性。元人绘画，继承宋人，所绘鹰的结构精准。至明代写意鹰走向成熟。代表作品有林良《古木苍鹰图轴》（南京博物院藏）。是图绘深秋时节，枯枝落叶。一苍鹰兀立岩之上，昂首雄视远方。笔墨晕染，妙用干笔、破笔，及勾勒点染。所画之鹰，雄健威武。林良《古木苍鹰图轴》与无款《柱石苍鹰图》相比较，已明显摆脱了宋元人的束缚，是明时期的代表作。

《柱石苍鹰图》运笔熟练，豪放中又见规矩，画面意境淡泊清幽。沧海中的柱石采用大斧劈皴，坚固耸立；其水波如云，围住柱石。鹰、柱石、水波，一气呵成，大有南宋人梁楷画风。

元人画鹰沿袭北宋画家风格，特点是结构形态精准，简练概括而又不显得呆板，其画面既有意境，又有趣味性。《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云：“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柱石苍鹰图》于工笔和写意之间，亦工亦写，法宋人画理，又开时代画风。2011年11月昆仑堂美术馆收到朱福元长子朱飞捐画后一月余，余与沈君即赴京城请故宫博物院杨新鉴家鉴定，当杨先生看到《柱石苍鹰图》时曾云：“元人画。明代画风之前奏，值得研究。”

右上角有两位进士题，其一邓存德题诗云：“柱立中流撼海潮，鹰扬神骏敛霜翘。何时借得天风便，高拂青云上九霄。”款落：“南康邓存德”。铃印：“海东斗大州长”（朱文）、“己丑进士”（朱文椭圆形）、“口卿可化”（朱文）、“廷輿



鹰桧图 故宫博物院藏



苍梧竹鹰图 山东省博物馆藏

图书”(朱文)。邓存德(1435-?),字新之,江西南康府建昌县人,南京钦天监籍。明朝政治人物。成化五年(1469)参加会试,得贡士第三十四名。殿试登进士第二甲第三十五名。其二戴珊题诗云:“天不风云海住波,英雄未便老嵯峨。立朝自佐成康化,谁向鹰扬续旧歌。”款落:“浮梁戴珊”。钤印:“戴珊廷珍”(朱文)、“甲申进士”(朱文)、“松厓”(朱文)。戴珊(1437-1505)《明史》列传第七十一载,字廷珍,号松厓。江西浮梁人。天顺八年(1464)与刘大夏同科进士。历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南京刑部尚书、左都御史。两位明代早期人、又是进士,在画上跋诗,这为此画不仅带来了艺术欣赏价值,也为鉴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考元代末年画鹰相关画家有张舜咨、雪界

翁两位,其合作的传世作品《鹰桧图》(故宫博物院藏)。《鹰桧图》右上角款落:“雪界翁画黄鹰,师夔作古桧,桐城口氏好事,遂与之。”其中画家雪界翁除此图款上提到外,无任何信息,待考。张舜咨生卒年未详,字师夔,号栎山,又号辄醉翁,浙江杭州人。曾任宁国路儒学教授,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调江浙行省承宣使,后调休宁县主簿。元末,又任漳州路龙溪、兴化路莆田县尹。善画,工书法,又精诗文,用笔沉着,颇有气势。传世作品中与画鹰相关作品有山东省博物馆藏《苍梧竹鹰图》和《鹰桧图》。《苍梧竹鹰图》笔法及构图,师法宋人。画面上方有多人题诗。宋画重写实,而元代绘画,已将传统的综合文化艺术融入其中,注重法度而不被传统所束缚。这种题款的形式与《柱石苍鹰图》类同。《苍梧竹鹰图》所绘之鹰,若宋徽宗赵佶,

竹、林及树、石皴法,既有宋人笔法,又明显迈向明代方向发展,也可谓明代前奏。而《鹰桧图》以水墨写意而成,画一松枝上独立一鹰,昂首远眺,注视前方,其目光咄咄。是图与《柱石苍鹰图》相似,画面意境富有趣味,远景为起伏的山石陡立,苍劲有力,墨彩渲染出坚实硬朗之感。整个作品虚实相合,唯鹰的画法,师承宋代院体画派。无疑,《柱石苍鹰图》当是传世之佳作也。

三、《十六罗汉像屏》

《十六罗汉像屏》,绢本,纵118厘米、横54厘米。无款。薛永年考:“此八轴条屏,画十六罗汉法相。每轴两尊,皆胡貌梵像,朵颐隆准,用铁线描,布色秾丽,山石树木则笔法粗犷,时参飞白。亦曾有专家定为元人之笔。或为明代画手传宋元稿本之作。”

据《大藏经》记载,十六尊者为西方释迦牟尼佛座下弟子,受释迦牟尼的嘱托,常驻人间,不入涅槃,不受生死果报,为众生作福田,受众生供养。罗汉在佛教早期,是独善其身的修行者,后逐渐演变成救世菩萨性质,在民间信仰中广为流行,并逐渐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

至晚唐五代,这一时期佛教禅宗已得到了发展,道教、佛教并盛,寺院中的壁画,深受重视。其中罗汉画最为流行,画家专以画罗汉而著名者众多,最著称者当是贯休,所创作的《十六罗汉图》最为人们所称赏。贯休的罗汉与唐代佛教艺术中出现的胡人形象,极为一致。但唐时佛像已渐趋世俗化,写实性很强。贯休一改这种时风,其笔下的罗汉变形,变怪,富有神秘感。日本收藏了多组相传是贯休所作的《十六罗汉》,以宫内厅收藏的最为有名,再是高台寺藏《十六罗汉》、东京艺大的十六罗汉、东京博物馆的十六罗汉,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藏的十六罗汉等等,其共同的特征是设色富丽,陪衬物多。有多幅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相似,传为贯休所作,实系宋人摹本。从文献史料的记

载中来看,这一时期的罗汉画创作数量很多,但存世画迹很少,故考其画风,尚有难度。目前所能见到的作品,多数罗汉为白描清淡者、粗放野逸者等。贯休作罗汉往往是“不类世间所传”、“梦中所睹尔”,故所绘罗汉,厖眉大目,或高颧隆鼻,面貌似“胡貌梵相”,风格怪异。这或许是贯休冥思悟对禅学的产物,也是禅宗境界的幻化。

两宋时代的罗汉画创作是继五代后又一鼎盛时期,画《罗汉图》不仅是用以供奉礼拜,而是为了赏玩,是把宗教题材世俗化,可以说是绘画史上的一大变迁。其中,孙知微、王齐翰、李时泽、刘松年、周季常、林庭珪、牧溪等人均属善画罗汉的画家。

刘松年善山水,其笔下的罗汉造型准确,头部表情亲和开朗,具有西域人物特征神韵,给观赏者有自然平和之感。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刘松年的《罗汉图》,正是受禅宗思想的影响,把佛教中守护在菩萨身边的罗汉,画成游山玩水的世俗僧人。画中的人物双手相交,伏在一斜横枝上,表现出对世俗的欢乐。罗汉头部造型准确,具有神韵。画风工整细润,铁线描人物线条流畅,服饰与面部用笔沉着稳健,神形兼备。而树木与山石,注重写实。营造了人与自然相依生存的氛围。

古印度惯用“五百”、“八万四千”等来形容众多的意思,还有五百比丘、五百弟子。故在五代以后,常出现在许多寺庙内的往往是五百罗汉像。诚然,十六罗汉引起汉地佛教徒的深厚崇敬,而五百罗汉是完美的传说。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周季常、林庭珪的《五百罗汉图》,值得一并研究。图中所画罗汉有“应身观音”、“布施贫饥”、升腾显瑞等等。特别如“洞中入定”图,似乎进入一种参禅高妙之境,尽管身旁是汹涌的波涛,身后有张开巨口的大蟒,也无暇顾及。从周季常、林庭珪此件作品中可以窥见其笔法已经娴熟,并继承了唐、五代以



十六罗汉像屏(选三) 绢本设色 118×54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来线描技法,运用自如。罗汉的形态以简笔勾勒,坚挺、凝拔的气象。罗汉的衣着,与水波纹环扣呼应,且以横行线为主,与画面上空中行走之罗汉,其下垂的衣纹,形成明显的对比。

昆仑堂美术馆藏《十六罗汉图》面相,神态平和。其十六罗汉八帧,每幅画二尊罗汉,或坐石上、或座椅上、或席地而坐、或作冥想状、或作显示神通状,造型变化多姿,面相或夸张、或写实,其毛发与肌肤的质感表现得尤为精彩。八帧中,唯有一帧二罗汉坐于椅,而左下角画有童子。这种构图方式,与贯休时期罗汉画相近,而其它七帧罗汉上方,都有山石、或老干云彩、或彩云飞瀑、或肥绿芭蕉封顶,多数构图与刘松年、周季常、林庭珪相近。又,八帧中其山石峰峦、奇树枯木,有李成、郭熙派风格特征,又受李唐的影响,多作小斧劈皴,坚硬、凝重,图中亦有马远等人大斧劈皴的痕迹,尤显水墨

苍劲、笔墨淋漓。此八帧十六罗汉图,虽无名款,而其人物传神,形象精准,功力深厚,传承了宋代罗汉画的特征。以笔者之见,传为元人画,亦无妨也。

与《十六罗汉像屏》相关连的《迦理迦尊者像》立轴,也是朱福元先生捐赠给昆仑堂美术馆,为晚唐无款画。唐代独立绘画,除敦煌石室和新疆地区墓葬出土的绢画之外,传世作品如凤毛麟角,十分罕见。画面断裂破损较甚,衬纸亦为麻质。杨新、薛永年两位先生考“可能出自敦煌,或古塔。画罗汉一尊,下有狮子。据画风初步判断,为晚唐时期作品”。也是昆仑堂美术馆馆藏年代最早的一件。杨新先生曾在《中国文物报》发表长文,高度评价,盛赞此图。《迦理迦尊者像》因画在麻布上,布面施粉较薄,也未掺入纤维,又因后世装裱成轴,其蛤粉大面积脱落,纱线变得昏暗。但虽年代久远,并几经转



迦里迦尊者像 麻本设色 62.5×34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传,画面仍能辨认。杨新考题:“图中绘一老僧,头部偏向一侧,面相清癯,略显骨骼,双目下视,朱唇,有须。左手以背支颐,右手前伸仰置膝上,身着大领宽袖白衣,端坐于床。前画一蹲狮,昂首向人,染赭色。老僧神情沉思,姿态随意,栩栩如生。右上有题榜‘七迦里迦’四字清晰可辨”。

杨新先生认为:《迦里迦尊者像》作品是画在麻布上的,经纬很松,所幸命纸(托纸)尚存。虽然残损脱落不少,但画基本保存完好。在高倍放大镜下,其纬线几乎逢经线必断,这是我

们许多绢本古旧书画作品中没有见到过的,显然这是麻织物的特点。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命纸也是麻质。因为可以找到麻头,不同一般楮皮纸。画面昏暗,也应当与用麻制质材有关,而非有意作旧,在后人仿制唐人作品中,也未见到过用麻布的。

由此可见这件作品由来久远。图中“所绘僧之形象并无怪异,完全似一普通老者,与贯休所画怪异罗汉不同”。龙门石窟看经寺中唐代浮雕石刻罗汉像,也是汉族人物形象,与此相同。迦里迦尊者头部正面偏向一侧,双目下视,左手以背支颐,右手前伸仰置膝上,身着大领宽袖长衣,似是趺坐姿势。尊者坐前。有一雄狮匍匐于地,仰首上视。这幅作品,看起来像是一幅线描作品,线条细劲有力,用高古游丝描而稍加按捺,既有节奏而又随意,与旅顺博物馆藏吐峪沟出土唐代佛画残片的描法极为近似。狮子的造型也很特别,其头部仰视是强行扭转。体型也不大讲究结构,毛发用平行线表示,看来作者完全凭己意创造,这点也与后世画狮有一定格式大为不同。再察《迦里迦尊者像》,简洁、古朴,显示出是一幅早期的罗汉画,在大家所知绘画作品《十六罗汉图》中,它是最早的一幅,应是晚唐时期的作品,可惜其余十五幅无从寻觅。这位画手,虽然没有留下姓名,而从这幅画像上,可以看到其艺术造诣,特别是“线描功夫,挥洒自如,举重若轻,非等闲之辈。或许由于有这些无名氏的努力,才能成就像李公麟这样的线描大师(杨新先生语)”。《迦里迦尊者像》之尊者,即罗汉,是佛陀得道弟子修得的最高果位。杨新先生认为,“《迦里迦尊者像》,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观赏价值”。故考《十六罗汉像屏》,当与《迦里迦尊者像》同鉴之,可知其佛教题材画的兴与盛。

(未完待续)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馆长)

查士标眼中的汪之瑞及其绘画

□ 任军伟

安徽博物院藏有一套汪之瑞所作《山水》册^[1]，该册开数不详，如今只保存有两开：一开

作《孤亭双树》，以墨线勾勒，少施皴擦，再以焦墨点苔，画风萧疏简淡；另一开作《岑石疏林》，以干笔皴擦，重墨提醒，显得神韵苍

秀。册后有黄宾虹 1936 年秋日题跋一开，其中有云：

夫六法用笔，舍悬腕中锋，易入魔障，何得谓非正派？今观其一钩一勒，无不从书法中来。查二瞻题无瑞画，以为人不能到，而知之者尤少。^[2]

在这则题跋里，黄宾虹认为只有查士标最懂汪之瑞绘画。的确，在“新安四家”中，查士标与汪之瑞之间交往最为密切。他们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还经常聚首交流绘画，因此他们既有师法传统上的相似，又有观念和画风上的不同。

汪之瑞，字无瑞，号乘槎，安徽休宁四都锡山头人。他早年生活在休宁，后来浪迹江湖，优

游于无锡、镇江、杭州、扬州及河南等地。查士标在休宁生活期间便与汪之瑞有交往。如查士标在《题汪乘槎遗迹》



汪之瑞 孤亭双树 纸本墨笔 23 × 49cm 安徽博物院藏

诗中有云：

一去人间四十年，只同野鹤唳辽天。

棱棱骨相堪图画，大笑重来一米颠。^[3]

此诗未署纪年，今已无从考证究竟题于汪之瑞的哪幅作品之上。但据诗中“一去人间四十年”，可知查士标在题跋这幅作品时，汪之瑞已经过世四十年了。即便此诗作于查士标生命的最后一年（即 1697 年），以此上推四十年，汪之瑞最晚在 1657 年便已辞世。在这首诗中，不乏查士标对汪之瑞的思念之情，同时也对汪之瑞的性格作了描绘，足见二人情谊之深，交往较早。在查士标眼中，汪之瑞无疑是一位“棱棱骨

相堪图画,大笑重来一米颠”式的人物。诗句中所说的“米颠”,即指北宋著名文人书画家米芾,因其“违世异俗,每与物迁”^[4],故被称为“米颠”。查士标把汪之瑞归为米芾一类的人物加以称赞,除了友情和同乡之谊外,说明汪之瑞的确是位颇有个性画家。张庚在《国朝画徵录》里说汪之瑞“气宇轩昂,豪迈自喜,土苴轩冕,有不可一世之概。”^[5]这比查士标对他的表述更为具体和形象。张庚还曾说:

酒酣兴发,落笔如风雨骤至,终日可得数十幅。兴尽僵卧,或屡日不起。非其人,望望然去之,虽多金不屑也。^[6]

如此看来,汪之瑞不仅性情豪迈,而且颇富激情。他平日嗜酒,待到酒兴酣畅之时,往往乘兴挥笔纵横,一日能作数十幅画作,待至酒兴阑珊,激情衰竭,便僵卧于床上数日不起。汪之瑞平日与人交往,也全凭个人喜好,对于不投性情之人,即使欲出重金求购其画,他也断然不应,懒得理会。

在“新安四家”中,汪之瑞是最为纵情任性的一位,这就使得他的山水创作对个人情感的抒发,要大于其对绘画技巧的追求,善写意而不求工细。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汪之瑞所作《松石图》轴^[7],上有诗题云:

天街夜雨翻盆注,山河涨满山头树。

谁家园内有奇事,蛟龙湿重飞难去。

题诗不仅书法刚劲,与画意颇合,而且内容亦颇为豪迈,这正是汪之瑞狂放性格的反映。从现存画迹来看,这幅作品在汪之瑞存世的画作中颇显另类,画面构图奇特,一松一石并峙耸立,造型甚为夸张,松树欲穿云天,渴笔焦墨,气势飞动,极具个性。画如其人,汪之瑞这种个性的笔墨表现,恰是他个人性情的体现。

汪之瑞曾在扬州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期间与同客扬州的休宁同乡查士标关系最好,除了他们的生活经历相似之外,关键还是二人的性格相近。查士标性懒、嗜卧、闭门谢客的性格

和举动,与汪之瑞的“兴尽僵卧,或屡日不起”,“虽多金不屑也”的性格颇为相类,正是气味相投。汪之瑞传世的画作上,大多有查士标的题跋,这些文字无一不是知人论艺的契合之语,亦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汪之瑞不仅重视师法前人,而且还常与查士

标交流探讨,二人经常进行绘画交流。如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十七著录有一套《书画合璧》册,即汪之瑞与查士标的合璧之作。这套山水册共计十开,汪之瑞在右侧作画,查士标在左方题诗,是他们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共同探讨而成。这从方濬颐著录查士标所作十首七绝诗的内容上略能知之^[8],而方濬颐还认为汪之瑞这套山水册“简拔古逸”。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幅汪之瑞顺治十年(1653)所作《山水图》轴,款署“癸巳之冬,象三命祝文白老社兄。瑞道人”。从画面表现来看,该作品应是汪之瑞晚年所作。此时汪之瑞的绘画,主要表现出一种极为简约的山水样式,画中山石亭树,简到只有几根墨线勾勒,较少施墨加皴,画面显得既简淡又高洁。



汪之瑞 松石图 纸本墨笔
179.5×78.2cm 上海博物馆藏



汪之瑞 山水图 纸本墨笔
136×56.7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汪之瑞 山水图 纸本墨笔 52×29cm
故宫博物院藏

浓墨重点,皴擦互用,颇得倪瓚、黄公望山水遗韵,的确有一种苍蔚的古气。这种画风特征,显然与汪之瑞师法李永昌并上追倪、黄有关。汪之瑞的山水,初学“新安画派”的先驱人物李永昌;李永昌学自元人倪瓚和黄公望。因而,与乃师一样,汪之瑞也尊崇并效法倪、黄,特别是对

传世汪之瑞的作品,大部分都作于入清之后。如故宫博物院藏汪之瑞顺治六年(1649)五月所作《山水图》轴^[9],款云:

己丑夏五月,画似跨千老盟兄,时余游豫,不觉笔下有离别之气。瑞识。

这幅画作是汪之瑞游居河南时为友人所作,而查士标在扬州看到此作时,已是三十年后的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了,画的右上角有他的题跋为证:

此乘槎真迹,古气苍蔚,如见伊人。瑞老道兄购得之,持以相示,为题数语。己未七月,邗上旅人士标。

查士标见此画如见汪之瑞本人,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并认为这幅画是汪之瑞的真迹,有一种“古气苍蔚”的画风特征。该画笔墨粗犷,

倪瓚山水的用笔,体会得尤为深切。如西泠印社藏有一套汪之瑞所作《山水图》册^[10],纯以干笔直线勾勒,略施皴擦,山形似几何体,笔法简括沉稳,画意萧疏,显然是受倪瓚山水影响的缘故。汪之瑞是李永昌的得意门生,现存李氏作品大致有粗、细两种画格。细笔山水“细皴淡染,皆百遍而成”,而粗笔山水则“寥寥勾勒,加点而止”。汪之瑞的山水显然得自于李永昌的简笔一路。对比“新安四家”现存画作,汪之瑞无疑是最早一位形成自己绘画风格的画家。他的简笔山水虽学自李永昌,但在山石的构造上,却比李永昌更富有变化,而在线条的蜿蜒之处,也比李永昌更具有韵味,这就使其绘画具有了较多的古气。总体来看,汪之瑞的山水,以渴笔焦墨勾勒为主,率性之中尚有一种清

秀。加之其题款书法刚劲精妙,且能以书入画,这便使得其画中用笔更多书写的韵味。正如上述黄宾虹所说“一钩一勒,无不从书法中来”。

张庚在《国朝画徵录》中谈到汪之瑞的绘画时说:

善山水。以悬肘中锋,运渴笔焦墨,多麻皮、荷叶等皴。爱作背面山。^[11]

上述安徽博物院藏汪之瑞所作《山水》册页两开,即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汪之瑞这种山水创作的特点,画面虽简淡,却能神完意足。其绘画中“渴笔焦墨”的用笔特色,也是汪之瑞与其他新



汪之瑞 枯树图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安三家清润画风的不同之处。汪之瑞古气苍蔚及简淡高洁的绘画,皆得到了查士标的认可。但查士标五十岁之前的画作,却以层林叠嶂而颇显繁茂的面目居多,汪之瑞显然对这种层林叠嶂的绘画多有不屑。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汪之瑞所作《枯树图》轴^[12],画中所绘物象甚为简略,仅有两株枯树与一座空亭,寥寥几笔墨线勾勒,枯树姿态俱现,枯树根部的几个浓墨重点也显得轻松随意,俨然一幅水墨简笔画。其上有查士标五十二岁那年夏天在扬州观赏此画时的题跋:

乘槎每不肖余画,曰:“古人画以简贵,今子层林叠嶂何为乎?虽举世非之,吾不顾也。”余至今愧其言云。丙午夏,观于邗上,因题并似日进兄教。石城旅人士标。

从跋文可知,查士标康熙五年(1666)夏日观赏这幅画作时,汪之瑞已经下世多年了。以查士标所忆,汪之瑞晚年绘画尊崇的是“画以简贵”的观念。其现存山水画作,大多是他这种绘画观念影响下的产物,画面一般都极为简淡。汪之瑞的这一路山水画风,往往简到只有笔线,却不见墨色,一根线便勾出一段冈峦,寥寥几笔便勾出一株枯树,且皴擦较少。纵使世人对汪之瑞这种画风很难接受与认可,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正因为汪之瑞固执地坚持着他所谓的“简贵”观念,所以他对查士标层林叠嶂的山水,很不以为然,故而才有查士标“乘槎每不肖余画”的言说。

查士标对于好友简淡山水及“画以简贵”的主张,是能够接受与认可的,并且在自己的绘画创作中践行。如其在康熙五年(1666)所作《山水》册十开之第五开款识中云:

大痴画以江山胜览卷为最,恨微伤繁冗耳。元人画以趣胜,惟用笔淡远得之,以是益悟简贵之难,不独在画也。^[13]

即便到了晚年,查士标还在他的创作中谈论这种观念:



汪之瑞 山水图 纸本墨笔
77.6 × 42.4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余画大都深邃者多，简洁者少，诚以多可藏拙，少难概括。此轴固不敢称合作，颇觉别有趣味。^[14]

可见，“画以简贵”的绘画观念，查士标虽在创作中有所尝试，但终究没能像汪之瑞表现得那么彻底与到位，所以查士标才有“余至今愧其言云”的感慨。汪之瑞的简淡，有时看来的确有失笔墨，太过简略了，以至于世人很难接受他的这种绘画。如浙江省博物馆藏汪之瑞所作《山水图》轴^[15]，亦有查士标康熙五年（1666）腊月望前二日所作题跋：

乘槎画近日绝少，而具眼者亦复寥

寥，此幅犹吉光片羽也。子参道兄独能鉴之，町畦之外，殊不易得，乘槎而在，又不知为之费几斗墨矣。老友梅壑道人不禁喜而为之识，时丙午腊月望前二日。

这幅画作，仅绘有一座孤亭与三五株枯树，皆挺立于坚硬的石坪之上，以渴笔勾线为主，山石略施皴擦，焦墨点苔，甚是简约疏淡。可见，汪之瑞这一构图样式和表现手法，已经成为他晚期绘画的主要样貌特征。查士标在题跋中说汪之瑞的画作流传下来的原本就不多，今能见到的原作更是寥寥无几，这幅作品一如他惯常的简约风格，而表现得更加简略，如其所云“犹吉光片羽也”。而时人普遍能接受与喜爱的，大多还是画面构图较为繁茂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自然入不了汪之瑞的法眼，倘若他还在人世，肯定又要有一番观念上的争论。作为甚是了解汪之瑞性格及绘画的查士标来说，看到有人能欣赏和接受好友的这种简淡一路的山水，自然是感到无比欣喜。该画虽无款无印，但无论是从风格样式，还是从表现手法上看，皆于上述浙江省博物馆藏汪之瑞顺治十年（1653）所作《山水图》轴相似，应是汪之瑞晚年之作。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汪之瑞这些署款的作品，反映了他画风嬗变的过程。其顺治六年（1649）五月所作《山水图》，画面构图尚较为繁茂，用笔亦浓重，皴擦尚多，师法古人的面目犹在，虽然狂放不羁，但也充溢着苍蔚的古气。而在顺治十年（1653）所作《山水图》中，其个性特征已经十分显著，画面主要以圆笔中锋的渴笔线条为主，皴擦较少，用墨也由浓转淡，画面显得疏散清秀，空灵明净，一尘不染，在格调上直逼浙江山水的清逸一路。这样看来，汪之瑞的山水，走的也是一条由繁茂至简淡的发展之路。

清初的山水画坛，复古模拟之风与宗派门户之见，成为一时风尚。查士标的山水显然受到了这种时风的感染，对前人画迹多有涉猎，

兼收并蓄，创作的作品颇合时人审美趣味，因此能受到广泛接受，求购者甚众。而汪之瑞有特立独行的个性，却不为时风所动，仍一如既往地追求他所崇尚的简笔山水，在创作中尽可能地涤除现实庸俗的习气，极力描绘冷逸的画境，以凸显其高洁的品格，迥异于时风。正如其自言：“画能疏能密，有奇有正，方为好手。”又曰：“厚不因多，薄不因少。”^[16]这无疑是他简淡画风形成的根源所在。总之，看汪之瑞的绘画，既不像看查士标的画，一望便知他取自某人笔意，也不像看浙江的画，有黄山实景作为比照。汪之瑞后期的山水，几乎抛弃了古法的束缚，其自我个性及其观念的展现发挥到了极致。他的画面山林野逸，简净脱俗，观其画作，似能净化看画人的心灵。

然而，汪之瑞这种过于简约的画风，却也遭到论者的批评。如张庚《国朝画徵录》所说：

无瑞自率胸臆，挥洒纵横，以视世之
规规于法者，诚豪矣哉！然非六法正派也。
不然，古人“十日一水，五日一山”又何以
称焉？若无瑞者，所谓不可无一也乎？^[17]

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评汪之瑞绘画时说：

落笔如风雨骤至，顷刻数纸。盖有轮廓
而无皴法，非绝诣也。^[18]

这些言论，认为汪之瑞简淡一路的山水，非六法正派，有悖“十日一水，五日一山”的画法常规，有种汪之瑞不是画里行家的说法。但通过查士标的题跋及其他相关资料，我们知道汪之瑞作画，任性率意，不拘成法，追求的是“画以简贵”、“以简胜繁”的表现形式。在查士标眼中，既有对好友汪之瑞性格的赞赏，又有对汪之瑞绘画的认可。这样看来，的确只有查士标最为懂得汪之瑞，无怪乎黄宾虹会说：“查二瞻题无瑞画，以为人不能到，而知之者尤妙。”

（作者单位：中国书画杂志社）

注释：

[1]汪之瑞《山水》册，安徽博物院藏。《明清安徽画

家作品选》影印，安徽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62页。

[2]黄宾虹题汪之瑞《山水》册，《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12册，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3]查士标《种书堂题画诗》下卷第107首。

[4]《宣和书谱》卷十二，见水赉佑《米芾书法史料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5页。

[5][6][11][16]张庚《国朝画徵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7]汪之瑞《松石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影印，安徽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63页。

[8]这十首七言绝句，依次录后。其一：“荒林几点隔江山，犹是离心落照间。从此邗沟自明月，寒鸦无数夜飞还。士标。”其二：“不是看山即画山，的应送老不知还。商量水阔云深处，随意茆茨着几间。”其三：“夙世烟波老钓徒，爱看掀舞狎江湖。年来心似无波井，犹带狂澜影相无。”其四：“不见林深春复冬，梦经兰若向炉峰。西窗一榻今闲否，来听苍天塔夜钟。”其五：“留客溪堂醉不回，薄阴深碧送残杯。如何暮雨千山下，不见行云一片来。”其六：“横云山北细林东，雨郭风塘宛转通。书画船归装不得，灯前口出有无中。”其七：“桑间船出水禽飞，棹拍莲花浪溅衣。山月下来残酒醒，摘将荷叶盖头归。”其八：“絮裳相伴踏清秋，健即闲行倦即休。记得罢琴吹笛夜，雨声茆屋小如舟。”其九：“最忆西风长板桥，笛床禅阁雨潇潇。只今画里犹知处，一抹寒烟似六朝。”其十：“寒鸦不共峭帆过，望里江城起白波。今夜月明同仁立，山中只较夜寒多。”见《中国书画全书》第12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309-310页。

[9]汪之瑞《山水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10]汪之瑞《山水图》册，西泠印社藏。《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第64页。

[12]汪之瑞《枯树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22册，第133页。

[13]查士标《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4册，第252-253页。

[14]金瑗《十百斋书画录》申集，《中国书画全书》第7册，第710页。

[15]《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11册第75页，及《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第61页。

[17]张庚《国朝画徵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18]秦祖永《桐阴论画》，中国书店1983年，第13页。

文彭年表(四)

□ 刘东芹

1559年 嘉靖三十八年 己未 63岁

●正月二十五日,为项元汴书草书《王勃采莲曲卷》,题跋云:连日偶临素师《自叙》,自谓颇有所得,戏书此以呈墨林,不知以为何如?己未正月廿又五日,三桥文彭。

数年后,项元汴获唐寅于正德庚辰(1520)所作《采莲曲》,又作水墨一帧于文彭书后,跋云:寿承学博赠予《采莲曲》,草法精妙,逼似藏真,余藏之数年矣。后得唐子畏《采莲图》以配之,可称合璧。子畏笔法游戏,几入化境,予偶效顰作此,览者得无咳予为东家施乎?元汴识。

又,此卷后有乾隆跋:元汴以文字唐画合装成卷,而作小景于后,其自命亦复不小。余题此图,意各有属,因于前后两帧分书之,并识梗概于此。文彭此书,虽放浪形骸之外,却是名迹。(以上见《钦定石渠宝笈三编》避暑山庄藏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081册,第310页。)

●二月二十日,父文徵明卒,由嘉兴任丁忧回籍。

●三月二十七日,作《致壶梁札》:“承赐新茶,不胜感感。虽在哀戚之中,即当烹而试之也。有暇过我一坐何如?人还草草奉复,不次,彭稽顙。壶梁尊兄侍史。三月二十七日”。(钱镜塘《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释文、考证》,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按:此札云“哀戚之中”,应为文彭守丧期间,故系于此年。钱镜塘书中另有许初致钱穀一札,亦提及壶梁,此人应为苏州人,与文彭、许初、彭年等熟识。嘉德2006春季拍卖图录(雅昌网)另有文彭致壶梁一札:除夕遣怀,客舍萧条事事无,挑灯独坐且围炉。音书入梦字千里,节叙惊心酒一壶。六十侍亲欣未老,他乡怀出愧虚物。承□□。京华春色好,偏是雪晴时。树冻初含韵,沟瓦欲动渐。风生尘冉冉,日下景教,彭顿首稿上,壶梁尊兄先生。朱射陂诗伴识。

●跋文徵明《石湖清胜图卷》。(黄尝铭《篆刻年历》,台北:真微书屋出版,2001年)

●十月,赋诗题文嘉《杜陵诗意图》。(黄尝铭《篆刻年历》。)

●十月二十四日,跋《文待诏石湖清胜图书画合璧卷》:春到江南何处好,石湖山水画图开。新蒲细柳一时绿,鸂鶒鸂鶒无数来。三月暮春湖水平,拖蓝泼绿映空明。青天倒挂芙蓉障,画鹢徐飞锦绣成。白鹭群飞天倒开,波摇山动水萦回。隋帆羨煞乘风舸,何啻张骞槎上来。茶磨楞伽叠翠屏,汀州芦笋立鸂鶒。白云轻薄摇波静,黄鸟丁宁唤酒醒。山压晴湖水映山,游人日暮不知还。行春桥上好风景,绿树红花满目



文彭 墨兰图轴 绢本 65×31.2cm
故宫博物院藏

斑。肠断春湖新水流，倾城儿女踏青游。郊台不识吴王事，指点楞伽最上头。一簇桃花红欲然，数枝杨柳绿生烟。奈何春光留不住，桃花零落絮满天。山西绯桃太含糊，竹里斑鸠逐队呼。形胜有馀心独苦，王符闭户草潜夫。昔年尝与履吉读书湖上，遂有斯作。继而伯起亦久住僧寮，山中景物已与相忘，因请诸公咸录旧题以代卧游。余诗虽不足以写山湖胜处，亦聊以发伯起之兴，伯起岂能终默默乎？己未十月念有四日，文彭识。（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三，《续修四

库全书》第1090册，第353页。）此图乃文徵明为张凤翼所作，张请王穀祥、袁尊尼、陆安道、文嘉、王世贞、王世懋等题跋。

●作草书《千字文卷》。（黄尝铭《篆刻年历》。）

●冬，临怀素《自叙帖》卷，纸本，高八寸五分，长二丈三尺。款：嘉靖己未冬日雨中戏临。钤印：文寿承氏、三桥居士、文彭之印。（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148页。）

●腊月，过项元汴书斋，草书唐司马逸客《雅琴篇》，款云：己未腊月，过墨林书斋，戏笔书此，快哉。文彭。（《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9册，天津博物馆藏。）

●此年，跋项元汴藏怀素草书《老子清净经》：右唐僧怀素草书《清净经》，笔法高古，其为真迹无疑。先君子于石田先生处尝见之，每与余言其妙，云后有刘世昌跋尾者是也。石田没，归邹氏，屡欲物色一观，不可得。邹氏没，又不知流落何处。己未秋，客来有示者，精神焕发，真有骤雨旋风之势，惜先君不得再见为憾。卷后有‘苏耆家藏’四字，耆字国老，其父子兄弟赏鉴精确，所藏法书名画甚多，素师《自叙》亦尝在其家。又有‘绍兴’小玺，曾入思陵秘府。韩平原当国时，内府珍秘多入其家，‘昼锦堂’印是也。在元为乔仲山所藏，故有‘乔氏篋成’印。仆平生最好素书，所阅甚多，未有如此之妙者也。展卷累日，不忍释手，因题其后而归之。嘉靖三十八年长洲文彭记。（汪砢玉《珊瑚网》卷二，四库全书本。）

●赵宦光生（1559-1625）

1560年 嘉靖三十九年 庚申 64岁

●二月丙午日，应姚阶（字子玉）之请为其曾祖前监察御史姚绶《穀庵集选》作后序，楷书。早前（嘉靖三十七年八月间），姚亦曾请其父文徵明撰书前序，相信乃托之文彭而请。李

日华云：“姚绶《穀庵集选》有文徵明序及文寿承楷书后序，皆精妙”。（《味水轩日记》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461页。）

文彭序兹引如下：姚氏为嘉禾巨族，虽代有文人而其大实始于穀庵，穀庵起家进士，为名法从，未几即解官而归，优游林下者四十余年。时以扁舟往来吴越间，携所蓄法书名画以自随。名山胜境无所不至，飘飘然望之如神仙，至今吴人犹道之不至，盖虽龟蒙之笔床茶灶，不足多也。虽然韩子有言：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夫穀庵之前有可闲，穀庵之后有观颐、东斋，后先济美，辉映浙西，故莫有能过之者。然非子玉集而刻之，则其传不传，不可必也。使子玉而无文，则刻不刻亦不可必也。然则子玉是举也，其重矣乎！所以于流离困顿之中，守之益固，行之益坚，以求无废先人之绪。呜呼，其难矣哉！子玉交余父子间最久，故既请先君叙穀庵之集，而复令余题其后，不忘世谊也。岂真以余言为可传哉？子玉有集若干卷，足以继其世，而未刻者益将有所待也。余官嘉禾，其子自虞为余门人，与弟宪虞、应虞皆恂恂诚恳。必能继父之志者，因并及之。嘉靖庚申二月丙午，嘉兴府学训导长洲文彭著并书。（姚绶《穀庵集选》，嘉靖间刻本，南图藏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

●三月十四日，在南京，篆《地官司徒》印，边款云：嘉靖庚申春三月十有四日，篆于金陵之秦淮寓楼，茂苑文彭三桥氏并识。（顾湘纂《小石山房印苑》卷一，清道光三十年（1850）顾氏小石山房刻钤印本。）

●四月，《停云馆帖》第十二卷成。所刻为文徵明小楷《黄庭经》及行书《西苑诗十首》、

●八月，为好友王穀祥六十生日祝寿，与谢时臣、许初、文嘉、文元发、袁褰、袁尊尼、袁梦鲤、陆师道、陆安道、钱穀、朱朗、周天球、沈伯麀、张凤翼、张献翼、彭年合作《南山之什》诗画册。（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六，四

库全书本。）

●十月，作《如南山之寿》印，边款：嘉靖庚申十月朔有二日，为养斋老先生篆，文彭。（顾湘纂《小石山房印苑》卷一。按顾湘原注云：右印为吾邑严文靖作，文靖号养斋，嘉靖庚申文靖年五十，国博故作此印以寿之。）

●约在此年，与子文元发邀王世贞撰其父文徵明《文先生传》。（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文先生传》。）

●约在此年，题吴宽《种竹诗》：右吴文定公种竹长句，先君时时诵之，亦尝书以示彭。今不知流落何处，忽见此卷，宛然余音在耳，盖公在铨衡暇时，想其标旨，迥出尘外，此笔法所以逾妙也，可不保诸。后学文彭谨题。（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集》第六册，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825页。）

按：跋中云及“先君”，应在文徵明下世之后，故系此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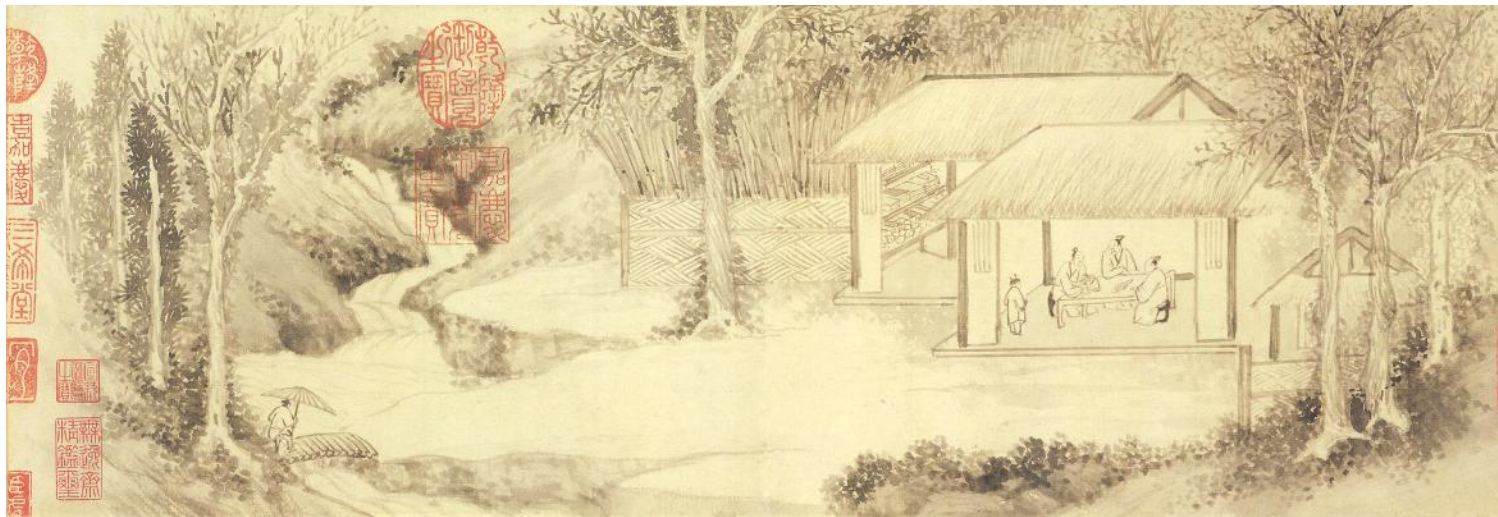
●唐顺之卒。

1561年 嘉靖四十年 辛酉 65岁

●正月立春日，跋顾从义藏《唐张旭草书兰馨帖》：右张长史纹绫上所书《兰馨帖》二十字，其为真迹无疑。盖草书不入晋人格辙，终成下品，颠素之所以得名者在此。今观其‘夺’字、‘气’字、‘佳’字、‘足下’字、‘人’字，皆从晋人中来。余阅书多矣，未有如此卷之佳者。世人重耳轻目，不可语此。昔素师绿绢两行，因元章所题而重，他日必有以余言为是也者，漫书以记。嘉靖四十年辛酉正月立春日，文彭书。（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第七十三卷，四库全书本。）

●正月二十九日，有致朱朗一札，赠诗言绘事并及食河鲀之事：

清溪有此力量，展若不须矾，则其渗漉当羞助高兴也。昔人奈范宽作画有诗，溪幽湿处全籍墨烟□□，亦尝如此，故敢喋喋尔。幸亮之。彭再顿首。子朗老弟足下。闻说河鲀上来，



文徵明 人日诗画卷 纸本墨笔 19.5×59.3cm 上海博物馆藏

寻旧友生口盘期放筋，玉体喜润美。饱饭原无害，庖烹不厌精。一年尝一度，物候若为情。文彭具草。春寒一首并上：腊尽期春至，春来寒更隆。凝云时隔日，舞雪又旋空。燥燥阴生润，重重又护风。梅花消息近，应只立墙东。辛酉正月廿九日。（《明贤墨迹》商务印书馆，1933年影印本。）

●闰月三日，跋其父旧作《人日诗画》：

嘉靖四十年辛酉闰月三日，章笈谷携以相示，盖乙丑（按：诗画作于弘治乙丑）至今五十有七年，而庚辰（按：前有王守于正德庚辰跋）至今亦四十有三年，卷中之人惟西室、隆池、笈谷三人耳，为之一慨，因亦附名其后。文彭。（《钦定石渠宝笈三编》乾清宫藏十一《文徵明人日诗画》，《续修四库全书》第1076册，第6页。按：后有文嘉于停云馆跋，时间近同，知其时家居。）

●二月二十一日，有致彭年一札，言及宜兴之行并与之探讨诗文：

别后遂有阳羨之役，又匆匆而归，虽漓墨同官，积雪可爱，竟不成一语，亦可笑也。昨来黄雾四塞，《汉书·五行志》以为爵土过制之征，其极曰不解，未审果否？又为大臣不进贤之象，良可畏也。二诗呈览，幸有以教之。“竺国”二字不知亦通否？向所读书《西涯上何图》题跋幸为早赐，感感！馀容面悉不备，彭稽颡，隆池尊兄。辛酉二

月廿一日。（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卷十三《文寿承尺牋册》，道光二十年刻本。第4页。）

●春，以篆书题文伯仁为顾从义所作《芳园十五景图卷》，文嘉赋诗。（黄尝铭《篆刻年历》。）

●为顾从义作《上海顾氏园林册》。（《玉雨堂书画记》卷二，转见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264页。）

●题陈淳《罨画图》。黄尝铭《篆刻年历》。

●六月十九日，作隶书《千字文》册页，款云：嘉靖辛酉六月十九日，文彭为少淮书于玉兰堂之北窗。（中贸圣佳2004年秋季拍卖会图录。2007年7月，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又以九十九万元拍出。）

●七月，题尤叔野藏赵孟頫小楷《赤壁赋》。（黄尝铭《篆刻年历》。）

●七月二十日左右，跋文嘉《雨后山图》，云：嘉弟酷爱云林之笔，其得意处，遂能乱真，虽沈君石田有所不逮，世人少有知者，特为拈出，文彭。按：文嘉作此图时间为‘辛酉七月十九日’，文彭跋后有王穀祥一跋，时在辛酉七月二十二日，故将文彭作跋时间系于此。（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150页。）

●七月二十七日,作行草《醉白堂记》,款云:嘉靖辛酉秋七月廿又七日,书于澄观楼中,三桥文彭。(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二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229页。此作又见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秋季拍卖会图录。)

●七月二十九日,家居,作楷书诗册,款曰:嘉靖辛酉秋七月廿又九日,三桥文彭书于悟言室。(《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四〇,《续修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575页。)

●秋,入京候补,皇甫濂(字子约)有《送文寿承教授终亲之丧北上》:白发沾微禄,青箱是旧声。亲终孤剑别,岁晚片帆征。斜日伤离色,清樽送远情。郑虔多逸气,官冷未须轻。(皇甫濂《皇甫水部集》卷之十二,明隆庆间刻本,第7页。)

●腊月望日,文彭跋沈周《韩锦衣园林六景》:右石田先生画册六幅,盖为韩襄毅公之子锦衣君所作,精妙无比,不知何缘流落至此。余寓京师,偶尔得之,喜不自胜,坐卧必观,殆忘寝食。昔嘉弟藏有石田画册,每以诧余,余将归而夸之,不能自秘。汝所一见遂豪夺而去,盖其好又有甚于余者,因思楚弓之义,更不必论其在彼在此也。题而归之,汝所其谨藏,不可更为人豪夺也。坐客皆为之一笑。嘉靖辛酉(1561年)腊月望日文彭谨题。(高士奇《江村消夏录》卷二,四库全书本。)

●约在此年十二月,购得索靖《出师颂》,欣喜不已,连作十五跋:

1. 此帖用五十千得之,老米所谓倾囊倒篋者也,或咎其贾太重者,诚不自量其力矣。然余性所好,况书生命薄,钱岂能为余积,不若从吾所好,庶几可以保岁晏耳。三桥文彭。

2. 先是仲冬二十八日见此帖于陆华甫邸中,恨不能攫而夺之。一旦入手,喜可知也。十一日彭再拜题。

3. 此颂若使松雪书之,贾可十金;若使苏、

黄书之,则再倍矣。等而上,若颜、柳,则又倍于苏、黄矣。又上,则欧、虞、褚、薛;又上,而右军父子,则贾当十倍。况此又在羲、献之前哉!张怀瓘在开元时已有定论,非吾自炫也。十二日衙退归,书以解嘲。(钤白文“悟言室印”)

4. 客有过余者,出以示之,客曰:匹夫怀璧,倘有力者将豪夺之,如何?噫!是何言邪?以秦昭之暴,不能加相如,赵璧固无恙也,岂可逆人之夺,而使楛带宝哉!客退,书此一笑。(钤朱文“文寿承氏”)

5. 古人有云:乐莫乐兮新相知,余得此口爱之不忍释手,譬之新婚而得国色矣,其乐当何如哉?十四日早饭后跋。(钤朱文“文彭”)

6. 尝闻右军书《兰亭记》,是已退笔,故时有贼毫,而益见其妙。此帖尤退笔之下者,其笔势用之无不如意,可爱可宝。(钤朱文“文寿承氏”)

7. 平生所阅晋唐法书不下数百卷,惟孙过庭《书谱》、怀素绢本《千文》、《梦游天姥吟》、颜鲁公《刘中使帖》更无遗憾,然妄自许可,或积习专工,则庶几万一。此帖则不可摹,不可刻,不可学,不知其从何而起,从何而止,真无上太古,法书第一也。望日焚香拜观谨书。(钤白文“停云生”)

8. 孙过庭云: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此卷尽之矣。十六日饭毕再题。(钤朱文“文寿承氏”)

9. 有侧笔,有匾笔,有浑厚笔,有露锋笔,一点之内有三转,一波之内有三折。如茅茨土阶,而气象自前;如污尊抔饮,而意周于太和之内。乍观或不能尽,愈观愈奇,愈可爱,仙哉!(钤白文“玉兰堂”)

10. 欧阳率更行道中见索靖碑,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曰“是虚得名耳”。行数百步复还,曰“犹是近代名手所为”。再观之,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余尝以为好事者言,岂有佳书而率更不一见识之,犹待再三乎?今见此卷,此言不诬

也。十八日,北窗下展阅书此。(钤朱文“文彭之印”)

11. 此帖惟休承弟能赏鉴之,今在五千里,安能缩地与之共谈耶。初见此卷而未得时,尝寄书与休承弟云“若得到手,虽衲衣持钵,亦所甘心。”他日相见,相与一笑。连日严寒,未尝不观,而不能尽兴,今日窗明几净,焚香拜观,因识此语,十九日,彭书。(钤“清盘室”)

12. 《出师颂》旧传惟萧子云书,相传纸中王蒙、笔下徐偃是已。然长睿亦指石刻为言耳,况索靖在三百年,又为真迹,其胜当何如哉!但不知此卷何据定为索靖,盖当时相传,必有所本,特不为米、刘诸贤所赏,故尔寂寂,宣政收购印章岂漫然者哉。其笔法高古,似非东晋以后人所及,故不能不归之靖耳。靖康之乱,流落人间,如思陵之悬购,韩平原、贾秋壑之笃好,皆不之出,乃为方方壶所得,而胜国诸大老亦都未见,盖必有畸人奇士如北燕张氏,宝爱过于头目,不轻以示人,亦无籍于题识耳。大抵古人书画之绝佳者多无题识,凡以此也。二十一日雨后书。(钤朱文“文寿承氏”)

13. 《出师颂》相传惟萧子云(书),索靖更在子云上,世所传《月仪帖》刻在秘阁续帖,今亦不可得已,况真迹乎。(钤白文“停云”)

14. 昔人有得萧子云一字,乃命其斋曰“萧斋”,索靖至一百九十八字,非世之至宝而何?重三字、脱一字、漫灭三字,止存一百九十一字。(钤朱文“文彭之印”)

15. 赵子固题落水《兰亭》,云性命可轻,至宝是宝。彼特石刻耳,若见真迹,当何如哉?况锤、索是二王所取法者。雁门文彭识。(钤朱文“文寿承氏”)

(以上均见端方《壬寅消夏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089册,第255-257页。)

按:跋3中提及“十二日衙退归,书以解嘲”当为文彭授顺天府学训导之后所跋,跋10中云:“此帖惟休承弟能赏鉴之,今在五千里,

安能缩地与之共谈耶”。说明此时文嘉尚在苏州,考文嘉于嘉靖四十三年春方动身往北京(《神州国光集》第四集文嘉跋《文衡山小楷千字文》:甲子春,将治装游燕都。)

另:文彭于此期购藏活动颇多,又曾于北京陆续购得元、明人书画五幅,后成《元明人书画合璧》一册,后跋(隶书)云:余游京师,从诸子侯中贵家见法书名画,盈箱满篋,意津津艳之,每恨穷措大一臃具。此道辄以性命为轻,何言倾囊倒篋,故兴之所寄,每于委巷闲肆,见有蠹馀卷帙,必为检视,积此数幅,亦成一斑。闲窗展玩,一洗车尘马足之困,所谓忙处得闲,亦不恶也。三桥文彭。(《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四二《元明人书画合璧》,《续修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669页。)

此册后有壬戌年五月文嘉跋:家国博寓京师最久,与诸勋戚交最厚善,凡鉴赏前代名迹亦最多。余兄弟于此道偏有微长,而国博尤深好古之癖,且淹留燕市,所获甚伙,如索靖《出师颂》,皆从都门得归。此五则为朱金吾所爱,欲以重赏购之,坚不与。携归藏停云馆示余,每暇必出相赏。米襄阳得奇石必拜,家兄于此卷亦然,追踪古人无忝矣。嘉靖壬戌五月题于润州舟次。

●为汤子重重题《淡墨风竹》小轴,作五言绝句,款云:辛酉子重重携此纸,为题绝句,彭。(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459页。)

按,约在此年,作《文徵明山水》后跋,未署年月,考其语气,应在家居服丧期间所作:先君留神翰墨,日不暇膳,追摹古名笔,必得其神方遂意。此卷少年所作,精力有馀,落笔不凡,今幸观于虎邱梅花楼,不胜风木之感。长男彭百拜谨识。(《钦定石渠宝笈三编》敬胜斋藏《明文徵明山水》,《续修四库全书》第1076册,第416页。)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胡石予先生年谱

□ 马一平

清同治七年(戊辰) 1868年 1岁

三月十六日(公历4月8日,下同)亥时(晚上9-11时)生于昆山县蓬阁镇北街家宅,父履斋公五十四岁,母谢氏三十九岁。起单名蕴,后字介生,号石予。

蓬阁胡氏系文定公(宋代著名经学家胡安国)后裔,明代末年由安徽徽州迁居昆山县蓬阁里,世代从事商业,开设典当铺和南货店,富有家产,在北街建有较大第宅。石予高祖胡文英,曾祖胡世德,祖父胡经正,字省斋,生二子,长即石予父亲胡钟祥(1815-1884),字元吉,号履斋,十三岁学毕诸经后,省



胡石予像

斋公命佐理店业,让其弟专心攻读。弟钟和好学上进,但不幸染瘵疾早亡。钟祥虽辍学早,但工余刻苦自学,博涉众艺,知医,善围棋,工度曲,丝竹管弦无不精通,书法亦苍秀。性俭实,刚毅威严,热心公益事,喜为邻里调解纠纷,公正无私,闾里颂扬。太平天国兵燹时外出避难,曾冒死潜回家取所藏钱二百缗,见积尸浮满于河,深感痛心,乃号召农人埋尸,埋尸一具予钱

二百文,直至罄尽所有。且做善事不留名,从未告诉家人与乡亲,体现了其急公好义、潜德行善的高风亮节。经过兵燹,第宅尽毁,家产也因之殆尽,家道就此中落。履斋公和继配夫人谢氏生育诸子皆殇,直至晚年得子石予,故爱之甚,但不溺爱,从小训以刻苦自立、真实做人的道理。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1873年 6岁

至镇南五六里孙家宅(1949年后长期属蓬朗镇北庄村,屡经拆并,今属蓬朗街道通辉村)孙缙云学塾读书。孙先生为昆乡宿儒,系履斋公所精心遴选。先生从师刻苦攻读十四年,打下深厚

国学基础。

清光绪三年(丁丑) 1877年 10岁

预聘同街曹万和药铺店主曹祥兴幼女曹桂贞为妻,与先生同年同月生。曹氏原籍江苏句容,世代业药店,清嘉庆年间迁居蓬阁镇。

清光绪七年(辛巳) 1881年 14岁

家益贫,无力继续从师学习,父履斋公与太仓城中某店铺商定送先生去当学徒,后因交

不出五十银元押柜费(保证金)而放弃。

清光绪十年(甲申) 1884年 17岁

闰五月二十八日(7月20日)父履斋公病逝,享年七十岁。因家贫为节省计,办丧事后即办婚事,母谢太夫人命举行“白婚”(以丧服成婚),与曹桂贞结婚。当年即在家半兰旧庐设塾授徒,以资养家。

清咸丰十年(1860),遭遇太平天国兵燹,胡氏第宅尽毁,仅存一幢无楼板的楼房。乱后履斋公葺而居之,上为卧室,下作饮食、读书、会客之所。其西向墙门砖雕门额“兰生桂秀”中“兰”字已损其半,故后先生称之为“半兰旧庐”,并将其用作书斋名。

清光绪十二年(丙戌) 1886年 19岁

与同镇张兆荣(后改名庸,字景云)、陆世勋(字功辅)、唐颂文(号北隐)、嘉定望仙桥毛荻川、张启泰(字孝臣,号顽鸥,后号病菘)、杨珍(字佩甫,号雪庐)等同学、文友七人结文社——竹林社,常相过从,作诗唱和,影响了蓬阁一镇风气,稍识文字者均爱好吟诗作对。

冬,老师孙缙云先生病逝。

清光绪十三年(丁亥) 1887年 20岁

与管槐(字少泉,晚号快翁)先生结忘年交(时管先生已七十岁),快翁居太仓南门外雪葭泾,家有补梅草堂,先生常趋访之。翁善医,能诗,工隶书,擅画梅,赠先生墨梅八帧,并教导平时多观范本,作画勿拘泥画稿,应取笔意。遂照之学画,并终生守之。

长子昌会(1887-1919,字元健)生,乳名润大。

贷去田二亩,得银十八元,以作考试之费。春应县试,夏应府试,得获前列。秋应院试,主考官为江苏学政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累迁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充云南、江西、浙江三省乡试正副考官。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任江苏学政,任内选拔人才,政绩

突出,是清末著名经学家、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和诗文家,一生著作宏富),考题文为“手之舞之,诸冯”,诗为“野烟深处夕阳中”,以第十二名成绩考入新阳县学,成为生员(俗称秀才)。此科新阳县学共录取生员十七名,汪家玉(1868-1935,字鼎臣,一作鼎丞,县城人,光绪十九年举人)以第七名、同学陆世勋(功辅)以第十名、同学张兆荣(景云)以第十四名同科入庠。

张景云赴苏州作家庭教师,欲得消遣之法,先生劝其学画,景云乞先生画梅十二册为范本。

清光绪十四年(戊子) 1888年 21岁

秋,与管少泉先生一起赴金陵参加乡试,均未中举。在金陵结识同乡严永山(教育家吴粹伦之师),严氏索先生画屏,仅数载未及涉笔而严氏卒。

清光绪十五年(己丑) 1889年 22岁

于姻亲家得读乡先贤唐彦槐(字茂林,号竹筠)先生遗著《闇斋诗稿》(其季弟彦模[号耕云]在太平天国兵燹后于故纸堆中觅得遗稿,缮录数部分赠好友),摘录若干首。彦槐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道光年间曾与表弟胡子通(字开泰)搜集里中人士二百年来诗篇,编刻《蓬溪风雅集》四卷。又于嘉定望仙桥文友张顽鸥藏书中得阅胡子通遗稿《绥我堂诗存》,亦摘录若干首。

清光绪十六年(庚寅) 1890年 23岁

春,张洪谟(字颂谋,一字仲谋)来先生学塾受业。

友张顽鸥能治印,先生亦学篆刻。

清光绪十七年(辛卯) 1891年 24岁

染重疾几殆,夫人亦大病,赖岳母章孺人护摄。

春,乡友陆君索画梅立轴,适先生家园圃野梅一树,历久无一花,乃作纵横繁枝,不缀花朵,并书《催花曲》补空处。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 1892年 25岁

与同乡张方中(1867-1932,字惟一,昆山首任民政长,著名书法家、诗人和教育家)订文字交。惟一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才复方姓,更名还。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 1894年 27岁

应同镇武秀才陶嘉祥(1852-1914,字聘三)之聘,至镇北三里宋家泾陶家做家庭教师,教其次子陶兆熊和幼子陶兆鸮,携长子昌会陪读。

冬与张惟一书信往返,虽相知三载,然至此时仍未谋面,至次年春县学岁考时才相晤。

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1895年 28岁

道光中至咸丰末里中先辈曾搜集清初以来里人之诗,相继刊刻《蓬溪风雅集》与《续集》。先生继承余绪,搜抄三十年来乡人之诗而优者,辑成《蓬溪诗存》四卷,并于闰五月撰《抄辑蓬溪诗存序》。同月撰《李伯均遗诗书后》,伯均为同镇李仲霞(1875-?,名文彩,清末秀才,民国后任昆山县清文局局长、国立东南大学事务主任,1955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之兄,年少笃学,惜卒年方二十三岁,录其遗诗十多首入《蓬溪诗存》。

十月二十三日(12月9日)大姐(异母生,长先生十多岁)患痢疾逝世。撰《张氏姊哀词》和《祭张氏姊文》,1914年收入《南社丛刻》第十集“文录”。张氏姊同治九年(1870)嫁同镇北街张姓家,不幸十五月而寡,公婆前已卒,扶族侄(张景云弟)为嗣子,五年后张氏姊又不幸患无慧奇疾,孤苦伶仃二十馀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1897年 30岁

女儿昌理生。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1898年 31岁

在宋家泾陶家坐馆已四年,此年回半兰旧庐家中设塾授徒,陶氏昆仲跟来继续随师攻读。因邻近镇村学童纷纷前来求学,学生增多房屋不敷使用,在旧庐后六丈处添筑两室,供

学生住宿用。当时学生除陶氏昆仲外,有周侃(南街)、周实(南街)、周聿修与周凯兄弟(安亭)、蒋宗晋(夏驾桥强巷)、管小谷(太仓南郊)等多人。

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1899年 32岁

正月初五日(2月14日)三子昌才(1899-1971,字叔异,著名教育家)生,乳名寿萱。

学生周侃(1884-1941,字品人,号菊生,教育家,昆山名医周适之父)以第二名考入新阳县学,成为生员(秀才)。

邵汝干(1891-1982,字季真,号可羨,著名体育活动家和教育家)九岁来先生学塾受业,受先生亲炙七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1900年 33岁

在家宅筑“听秋室”,与两年前所造两室相连。

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1901年 34岁

学生余寿颐(1879-1930,原名家驹,后改名天遂,字荫毅,一字荫阁,著名教育家、诗人、书画篆刻家和名医)以第五名考入新阳县学为生员。朱文鑫、吴粹伦、周梅初分别以第一、二、三名同科考入昆山县学为生员。

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1902年 35岁

岳母章孺人卒,享年六十七岁,撰《外姑章孺人事状》,1916年收入《南社丛刻》第十九集“文录”。

学生张洪谟以第四名考入昆山县学、陶兆熊(字仲葵)以第八名考入新阳县学,成为生员。后张洪谟行医为生,又任蓬溪两等小学堂国文教员。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 1904年 37岁

女儿昌理八岁殇。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1905年 38岁

夏间六月中咽喉大痛,为节省计未求医,自狂饮白虎汤,因摄入石膏过多,致伤胃成严重胃病,并演变为泄泻,缠绵累及十馀年。

学生陶兆鸮(字公亮,后为石予长婿)以新阳县的唯一一名学额,考入苏州府学,成为生员,但不久,八月初四日(9月2日)清廷就下诏废除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成了真正的末科秀才。

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1906年 39岁

六月,寄张惟一五言长诗。

停办私塾。

七月,与长子昌会一起赴沪求新学,分别考入上海东城师范传习所和半景园师范传习所学习新学半年。游半景园五峰亭,诗以记之。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1907年 40岁

经好友方还(字惟一)介绍,赴吴门任教于师范传习所。旋又任教新创办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1911年12月改为吴县县立第一中学,1913年7月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二中学,1952年起改为苏州市第一中学,俗称草桥中学),教授国学和修身课,并任舍监和年级主任。家不在苏州的舍监老师住在学生宿舍楼上的卧室内。不任舍监后,学校分给校园东侧二间宿舍,先生雅称东庐,并在屋边隙地种梅培兰,营造雅致环境。

六月三十日(8月8日)幼子昌治(1907—2005,字敬修,红军老干部)生,乳名分信。

七月忘年交余少英(史秉珪,字信卿,余天遂之父)先生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画墨梅赠兴化许玉书(炳麟)。

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1908年 41岁

为锻炼学生体魄,参加学校组织的远足活动,带领学生游无锡惠山。

应振华女校(苏州市第十中学前身)聘,课馀开始在该校兼教国文。

为屈荆才画扇并题诗。

邱樾(1860—1936,字荫甫,晚清贡生,地方耆老和文人)搜集其友严永山诗成《有恒庐诗存》一卷,自为之序,并征人题辞,先生撰《有恒庐诗存跋》。

门人周实(1888—1943,字季蕃,书法篆刻家和教育家)也至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工作,达七年。

冬携管快翁画赠墨梅至吴门,装池后悬之宿舍壁,晨夕观赏。

清宣统元年(己酉) 1909年 42岁

陈摩(1886—1945,字迦龢,号迦兰陀,斋名松花石室。江苏常熟人,师从江南老画师陆恢,山水、人物、翎毛、虫鸟、走兽,无所不精,尤以花鸟为最,亦擅书法。曾任苏州草桥中学、省立第一师范、第二工专、苏州美专等校美术教师、教授,从事艺术教育十馀年。门生众多,尤以陆抑非、张辛稼、王季迁等名震画坛。)任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美术老师,与先生同事,先生画梅,辄与之商榷,迦龢赠先生墨梅屏条四帧。

八月,撰《跋快翁墨梅》,1916年收入《南社丛刻》第十九集文录。

九月八日(10月21日)起带领学生远足,游常熟虞山,作纪游诗十三首。

友人陆静山卒,挽以诗。

清宣统二年(庚戌) 1910年 43岁

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第二届学生叶绍钧(1894—1988,字圣陶,著名教育家、作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第三届学生顾诵坤(1893—1980,号颀刚,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钦慕老师诗才,常借先生诗稿抄录成副本,揣摩学习,并学写诗作请先生指点。先生有“吾门两生叶与顾,手抄吾诗乐不疲”之诗句,并夸叶圣陶诗颇多慧想。

赠陈迦龢七古一首,迦龢亦喜录先生诗。

四月,中学堂新任监督(即校长)袁希洛(1876—1962,字俶畚,号雪龢,江苏宝山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之一,民国后吴县县立第一中学和江苏省立第二中学首任校长)以《访寒山寺》诗索先生和作。

四月二十八日(6月5日)第一次大型全国性工农业产品展览会——南洋劝业会在南京

开幕,作为带队教师率学生前往参观。

与盐城徐荔亭(名燮,字文广,元和县学官)互绘墨梅相赠。

秋,结识金山张堰高旭(1877-1925,字天梅,著名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为其题《花前说剑图》。

学生张洪谟卒,哭悼以诗,有“贤劳原自古,孝友况于今”句。

在课堂上讲授唐人张继《枫桥夜泊》诗,当晚(星期六)即雇两条船,约十多位住宿学生一起去枫桥听夜半钟声,实地体味意境,然寒山寺只有晨钟,乃决定夜泊坐等天亮,翌晨改道去天平山游览,一时传为佳话。

冬,得观同学张景云诗近作。

幼女昌孝(1910-1996)生。先生夫妇共生育子女十三人,夭折子四人,女三人,存活子四人,即昌会(字元健)、昌学(字希道)、昌才(字叔异)、昌治(字敬修),女二人,即昌明、昌孝。

清宣统三年(辛亥) 1911年 44岁

三月下旬参加学校组织的师生远足,游杭州西湖,有纪游诗十二首。返途中在嘉兴巧遇高天梅(前未谋面),一见如故。远足后学生叶绍钧写了二万余字的《武林旅行记》,请先生批改并求题辞,乃作七言古风一首。

秋,再见高天梅于苏州,为其画梅,并题五言诗一首。

八月十五日中秋(10月6日)在高天梅、余天遂、柳弃疾(1887-1958,字亚子,吴江人,著名爱国诗人、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南社创始人之一)的介绍下,加入南社(入社书为190号),成为南社著名诗人。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至苏州,先生欢欣无比,密切关注革命形势的发展,在苏州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非常具有鼓动力,听众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每日看到报载重大新闻,必作诗记之,一续再续,凡二十六续,至12月29日选定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止,共成《秋风诗》七律66首,表达了对辛亥革命志士与民主制度的拥护和向往,部分刊于其友陈去病(1874-1933,字佩忍,号巢南,吴江同里人,著名诗人、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南社创始人之一)主持之《民苏报》(一说《江苏大汉报》,先生自序说《民苏报》,待考),《秋风诗自叙》1914年刊于《南社丛刻》第九集“文录”。先生高足、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生前十分推崇《秋风诗》,将其比作杜甫之“诗史”。

民国元年(壬子) 1912年 45岁

公历元旦余天遂被聘任为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1月上旬投笔从戎,加入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戎幕,随军沿津浦铁路北上讨伐张勋部。从南京出发那天,先生送行,作《送疾依入粤军》:“杯酒分襟欲暮天,送行诗句补驰笺。征途风雪三千里,旧业文章二十年。忧国自应歌当哭,去家无复梦相牵。却劳病眼登高望,万里平沙漠漠烟。”天遂作《参加北伐倚装步石予夫子原韵》诗:“无限愁情不老天,销魂诗句漫题笺。吴门风雨今三载,马帐笙歌旧廿年。身世最怜趋俗惯,心期久恨有家牵。书生戎马关山月(在《南社丛刻》刊出时改为“阿依此去真豪放”),蹴破黄河万里烟。”(其中“吴门风雨今三载,马帐笙歌旧廿年。”作为“马帐”的释义示例被收入《汉语大词典》)先生有《寄怀天遂》诗。

年初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改为吴县县立第一中学,由公立民办改成官办,袁希洛继任首任校长。苏州府中学堂(前身是正谊书院,校址在可园)整建制并入吴县县立第一中学。

与金山高燮(1879-1958,字吹万,著名诗人、作家和藏书家,“江南三大儒”之一)、泾县胡怀琛(1886-1938,号寄尘,著名学者、报人、诗人和国学家)订交,并诗画唱和。春画墨梅并诗赠高吹万、胡寄尘,吹万以和诗书成短屏四帧为答;寄尘和诗三首,载《太平洋报》。

先生性喜山水,然教务在身,家慈在堂,不愿远游,故请友人绘《近游图》,并征题咏,以作神游,聊解不能远游之憾。十月撰《近游图叙》,1913年9月刊于《国学丛选》第三集“文类·文录”,又请柳亚子代向南社同道广征《近游图》和题咏,1914年刊于《南社丛刻》第十一集“文录”。

家圃中梅花,年年开花,极疏影暗香之妙。遭邻人砍伤后萎折,心痛不已,特作梅花图以吊。友人张君见后很是喜爱,乃以盆梅易画而去。

长孙思屯(长子昌会的长子)生。

秋,文友张顽鸥卒,挽以诗。

作《和惟一四首》诗。

十月十九日,同事陈昌年去世,撰《书陈昌年》,1914年收入《南社丛刻》第十集“文录”。

冬获陈世绶绘赠《近游图》一帧。

开始在三元坊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江苏省苏州中学前身)兼授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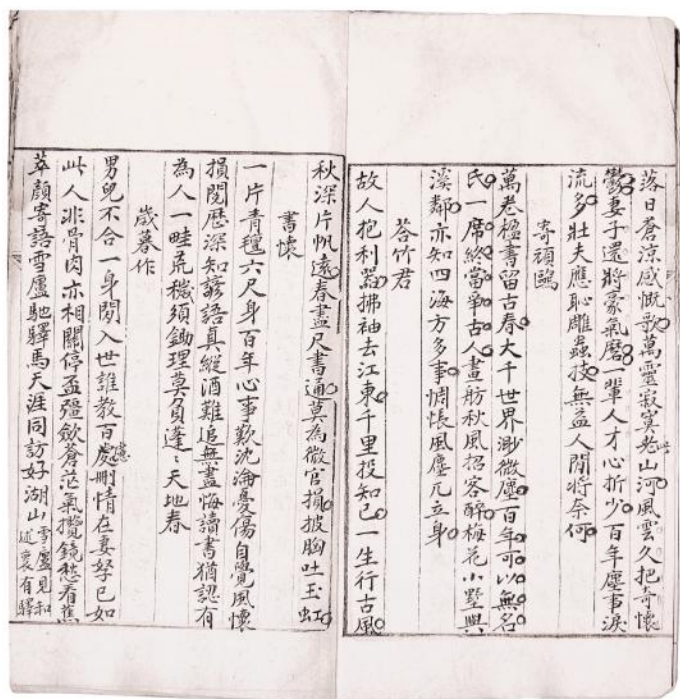
在《南社丛刻》第七集(1912年)“诗录”刊出《送疾依入粤军》《周实丹烈士挽诗二首》和《题实丹遗著后》。同集“诗录”刊出余寿颐的《步石予先生送行原韵》;金山高旭(钝剑)的《次韵答石予》与《乞石予作梅花》;“词录”刊出余寿颐的《金缕曲(石予夫子以自画墨梅命题谨填此阙)》。

民国二年(癸丑) 1913年 46岁

1月,汪家玉继任吴县县立第一中学校长。

2月5日(壬子年除夕),社友顺德蔡守(1879-1941,字哲夫,著名诗人、书画篆刻家和收藏家)绘赠《近游图》一帧。

年初为昆山王德森(1857-1943,宿儒名医)之《东篱采菊图》题诗五言古风一首。



胡石予诗稿手迹

春,带领草桥中学学生远足,再游杭州,作纪游诗十四首。三月二十九日(5月5日)晚,校长汪家玉在楼外楼饭店宴请带班老师。

同事陈迦龛绘赠《近游图》一帧。

四月,柳弃疾《奉题石予先生近游图一律》:“不学灵均赋远游,寻常丘壑足淹留。只柑新约听鹁伴,一斗还须与酒谋。随分湖山供啸傲,无边风月倦沉浮。嗟余济胜浑无具,梦里追随未自繇。”

五月,方还书赠先生扇面(和先生西湖诗五首),六月方氏又作《题近游图诗》五古二首。

7月,吴县县立第一中学改为省立,更名江苏省立第二中学,袁希洛又出任首任校长。

加入高燮等15人发起组织的国学商兑会(1912年6月30日在金山张堰镇成立)。

偕萧山陆琪(号支巢,工书画,隐居虎丘山下养真草堂)同游龙寿山房(在苏州山塘街半塘桥下塘,为寿圣寺毁剩别院),拜瞻血书《华严经》八十一卷(元季高僧善继刺十指取血,书一年又七个月,将终卷而圆寂),明清两朝名流

题誌多达四百余人,先生亦赋七绝一首。

9月出版的《国学丛选》第三集“文类·诗录”刊出高天梅《题胡石予近游图》。

秋,获常州画家汤涤绘赠《近游图》一帧。

三子昌才蓬阁初等小学校毕业,至夏桥东庄昆山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读书,旋因母亲舍不得其年幼离家住读,回蓬阁镇停学一年。

12月出版的《国学丛选》第四集“文类·诗录”刊出《石子吹万招入国学商兑会赋此答云》等六首。

整理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至民国二年(癸丑,1913)四年间所作诗,存218首,订为《半兰旧庐初稿·草桥集》卷一,由昆山同乡兼昔年县学同学汪家玉题端。

民国三年(甲寅) 1914年 47岁

春,从农家乞得数竿竹,移栽家宅后圃,欲求绿竹漪漪、萧散清逸、临风弄月之韵致。

三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八集“诗录”刊出《哭渔父先生》等十六首。

胡寄尘题赠《近游图》七绝一首。

作《与天遂夜话》七律三首。

游木渎羡园,晤张闾如、陆棣威。

诗送金松岑(1873-1947,名天翮,号鹤望,吴江人,著名教育家和国学大师)游庐山、衡岳。

五月初四日(5月28日)柳亚子从上海抵苏州,先生参加欢迎酒宴,合席有南社社友五人,诗酒慷慨,评说国是。

五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十集“文录”刊出《张氏姊哀词》《祭张氏姊文》和《书陈昌年》;“诗录”刊出《秋感》等八首。

夏,金松岑题赠《近游图》五言长律一首。

6月出版的《国学丛选》第五集“文类·诗录”刊出《次吹万韵》等九首。高燮(吹万)也在“文类·诗录”刊出《石子索书近制口中占一绝应之》。

农历闰五月二十八日父履斋公百岁冥寿,

撰《先府君行述》,当年八月刊于《南社丛刻》第十一集“文录”。

7月,汪家玉继任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校长。作《秋意十八首》诗。

七月,寄赠社友傅尊墨梅与诗,傅氏次和一首,有“昆山胡蕴真奇卓,载画满囊诗一肩。”精粹之句。傅尊(1882-1930),改名熊湘,字文渠,一字君剑,号钝安,别署钝根,后省为屯艮。湖南醴陵人,著名文学家和国学家。

题赠社友无锡王蕴章(1884-1942,字蕲农,号西神,著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西神樵唱图》五律一首,蕴章回赠《金缕曲·题胡石予〈近游图〉》一阕(五月刊于《南社丛刻》第九集“词录”)。

八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十一集“文录”刊出《近游图序》与《先府君行述》;“诗录”刊出《席次赠亚子》等八首。又在同月出版的第十二集“诗录”刊出《与天遂夜话》等十二首。

带三子昌才至苏州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11月2-4日江苏省立学校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在南京举行,率学生赴宁参加。

十月,社友青浦万以增为先生《近游图》作序。

同月,亲家陶聘三卒,年六十三岁。

从友人吴门吴翰城(吴粹伦族兄)处借得昆山清中叶先贤潘道根先生《隐求堂诗存》两卷,拜读摘录。

立冬日(11月8日),社友傅钝安又题赠《近游图》七律一首。

小雪后三日(11月26日),赠柳亚子《题亚子分湖旧隐图》七绝四首,刊于次年五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十四集“诗录”。

冬,在学生郑愿宗(1895-1992,后以号逸梅行,著名文史掌故作家)手工课制作的帖架上绘墨二枝。

12月出版的《国学丛选》第六集“经类”刊

出《读左绎谊(未完)》;“文类·文录”刊出《张氏姊哀词》与《先府君行述》;“文类·诗录”刊出《秋感》等十四首;“文类·词录”刊出《蝶恋花·题寄尘所辑兰阑清课》;“商兑通信录”刊出《与高吹万书》与《覆高吹万书》。高燮(吹万)也在“文类·诗录”刊出《胡石予索题近游图作此赠之》;“商兑通信录”刊出《答胡石予书》。

民国四年(乙卯) 1915年 48岁

春,同事魏迪元归湘省母病,以诗送之。迪元名荣恺,湖南邵阳人,学校文书,体育教员魏旭东族叔,喜吟咏,常与先生诗作唱和。

三月,方还自北京南下来草桥学舍看望先生,书近作诗若干首示先生,并与先生联床夜话。

春,社友丹阳张素(1877-1945)题赠《近游图》词一阙。

三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十三集“文录”刊出醴陵傅尊(钝根)的《与胡石予书》;“诗录”刊出梅县林百举(一庵)的《题石予近游图》、傅钝根的《为石予题近游图序》与《石予寄赠画梅并诗次和一首》、歙县黄质(滨虹)的《为石予绘近游图为题一绝》;“词录”刊出南昌陶牧(小柳)的《三儿渡江云·题石予近游图》、吴江沈昌眉(长公)的《买坡塘·题石予近游图》。

同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十四集“文录”刊出《柳钝斋先生像赞》(钝斋为亚子父柳念曾先生,1912年逝世,为柳亚子所撰)、《变雅楼三十年诗征序》(当年正月为高天梅所撰)等五篇;“诗录”刊出《题亚子分湖旧隐图》《题钝根红薇感旧记后》等四十五首。同集“文录”刊出青浦万以增(继长)的《胡石予近游图序》;“诗录”刊出浙江嘉兴谭天的《题石予近游图》高吹万的《题石予近游图》、余天遂的《叠韵酬雪盒并呈石予师二首》。

5月4日起带领学生远足,遍游常熟虞山名胜,作纪游诗十四首。

立夏日(5月6日)登虎丘。

作《示诸儿》五言长律五首和《续示儿诗》五言长律一首。

夏,高天梅题赠《近游图》七律一首,先生题冯柳东为高天梅绘之《杨柳岸晓风残月图》诗。

夏,作《和岁寒居士(王德森)六十自述》五律一首。

幼子昌治入蓬阁初等小学校读书。

10月1-3日江苏省立学校第二次联合运动会在苏州阊门外下津桥第五团操场举行,先生撰四言纪事诗十二首。

致柳亚子书,附诗五首。

社友高吹万题赠《近游图》七律一首。

社友黄质(1865-1955,字朴存,号宾虹,国画大师,著名诗人和学者)绘赠《近游图》并七绝一首:“漫天一色乱云浮,黄叶萧疏已入秋。却喜南华刚读罢,会心濠濮惠庄游。”

蔡哲夫自香港寄赠诗,叠韵和之。

寄傅屯艮《孤松行》索和诗和《双松篇》诗。

12月出版的《国学丛选》第七集“经类”刊出《读左绎谊(续)》;“文类·文录”刊出《变雅楼三十年诗征序》;“文类·诗录”刊出《题高天梅变雅楼三十年诗徵》等十首。

整理民国三年(甲寅,1914)至民国四年(乙卯,1915)所作诗,存245首,订为《半兰旧庐初删稿·草桥集》卷二,汪家玉为之题耑。

又整理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以来所作文,存27篇,订为《半兰旧庐初稿·文》,亦汪家玉为之题耑。

民国五年(丙辰) 1916年 49岁

春友人吴翰城病故,撰《吴翰城哀辞》。又应社友陈去病之请,撰《陈母沈太君诔辞》(陈嗣母沈太君于去岁病卒),两文均刊于当年十一月出版之《南社丛刻》第十九集“文录”。

撰《大通桥古银杏记》,亦刊于《南社丛刻》第十九集“文录”,后曾充作昆山国文阅读教材。

草桥中学二年级学生创立文艺会,出会刊

三期，诸生将文艺会改名为企社，会刊一并更名，特请先生作序，先生爱生如子，即撰《企社弁言》以应，也刊于《南社丛刻》第十九集“文录”。

五月初十日(6月10日)蔡哲夫自香港再次寄赠亲绘《近游图》一帧。

初秋，在社友王德钟(1897-1927，字玄穆，号大觉，著名诗人)的介绍下，陶惟堪(际可)绘赠《近游图》并题五绝一首。

10月出版的《国学丛选》第八集“经类”刊出《读左绎谊(续)》；“文类·文录”刊出《哭翰城哀词》；“文类·诗录”刊出《螭庵自都下南回来草桥校舍夜话》等十二首。

十一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十九集“文录”刊出《跋快翁墨梅》《外姑章孺人事状》《与柳亚子书》等十篇；“诗录”刊出《秋意十八首》等六十三首。同集“诗录”刊出湖南醴陵刘谦(字约真)的《为石子题近游图》。

冬至日(12月22日)，金山姚光(1891-1945，字凤石，号石子，著名文学家和诗人)为先生《近游图》作序。

民国六年(丁巳) 1917年 50岁

作五十自寿诗八律和祝曹夫人五十寿古风四首。

文友杨雪庐卒，画梅一幅，并作挽诗野空处，焚于灵前。

过南溪老屋余少英旧宅，作诗。

社友王德钟(大觉)寄赠先生《青箱集》和《乡居百绝》两书，并修书乞先生画梅，先生自谓：“喜画巨幅，纸小便无用武地。”即贻墨梅，大觉获梅后戏占一绝：“画梅幅小负君才，却似幽花撑壁开。试问乾坤如许大，可能容得几株梅？”传为趣话。

七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二十集“文录”刊出王大觉的《与胡石子书》；“诗录”刊出王大觉的《题石子近游图》《题石子近游图》和《石子为予画梅》。

三子昌才毕业于苏州江苏省立第一师范

学校，在该校附属小学实习一年。

10月出版的《国学丛选》第九集“经类”刊出《读左绎谊(续)》；“文类·文录”刊出《大通桥古银杏记》与《纪王氏兄弟》；“文类·诗录”刊出《吹万来苏画梅为赠系以一诗》等八首。

十二月，获山水画家平湖徐铤(字百梅)绘赠《近游图》一帧。

民国七年(戊午) 1918年 51岁

辑《半兰旧庐杂著》，订成一册。

撰《胡善先传略》。

曹夫人足疾，就医苏州天赐庄博习医院。

三子昌才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12月改为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

七月，常熟俞钟銮题赠《近游图》五言长律一首，钟銮(1852-1926)，字金门，光绪二十三年举人，翁同龢外甥，清末诗人、书画家和名士绅。

秋撰《读论语》五言长诗。

10月出版的《国学丛选》第十集“经类”刊出《读左绎谊(续)》；“文类·文录”刊出《书张国秀》、《书张洪谟》与《陶聘三家传》；“文类·诗录”刊出《内子五十》等十八首。高吹万也在“文类·诗录”刊出《有怀胡子石子并谢画梅》。

民国八年(己未) 1919年 52岁

二月，门人余天遂题《近游图》七律一首。

同月阅清何子贞《东洲草堂诗钞》，边阅边摘其佳诗妙句。

4月22-24日举行江苏省立学校第五次联合运动会，率学生赴南京参加。

夏，登昆山马鞍山，吟《玉峰》诗一首：“玉峰峰不高，冈峦自起伏。摄衣一登临，曲折与往复。下山披草坐，眼前一堆绿。乃觉看山佳，上山殊仆仆。”

长子昌会(太仓县蓬莱乡小学校长)进县城开会罹疫，归即亡，年仅三十三岁。作《哭昌会儿》五古九首，刊于1920年10月出刊之《国学丛选》第十二集。虞山俞金门寄诗慰唁，先生报以墨梅一帧和七律一首。

七月上旬获社友金山倚云女士(高杏,高旭堂妹)绘赠的《近游图》和《门间倚望图》各一幅。

幼子昌治初等小学校毕业,入夏桥东庄昆山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读书,旋因母亲舍不得其年幼离家住读,回蓬阁镇相继入李伯安私塾和蓬阁初等小学校英语补习班学习。

秋,编制《半兰旧庐所有书(即书目)》,其藏书除大量购买外,有不少为赠书,赠者中有吴县吴讷士、吴县卫选青、丹徒赵蜀琴、济阳张文炜、武进诸少甫、昆山赵学南、常熟陈敬如、吴县方和甫、金山姚光、吴江柳亚子、昆山张筠亭、太仓毕季足、吴江陈去病、吴江沈志儒、昆山王丕嘉、溧阳周允言、昆山吴翰城、吴县孙伯讷、金山高吹万、常熟王君华、揭阳吴光国、青浦何楞僧、支伯云、邵阳魏迪元、吴县高辛生、吴县冯公才、常熟殷季鏊、昆山王德森、青浦王大觉、无锡华紫翔、吴县严鹿苹、嘉善周斌、韩国金泽荣、邵阳魏君佺、崇明吴采人、吴县蒋粟赉、吴江金天翻、金山高旭、吴县陶织云、醴陵傅尊、太仓钱兰陔、吴兴赵竹君、嘉定张孝臣、蒋锡蕃、上海朱少屏、吴县程师许、邵阳陈楚奇、周庄柳率初、彭赓三、陆简敬、金山高圭、吴县彭子嘉、常熟俞钟銮、吴县范君博、上海孔子怡、太仓陆菊裳、广东陆丹林、吴县江苻溪、于觉庐、吴县申翰丹、丹阳林晦庵、吴县张郁文、吴县潘敏斋、昆山汪家玉、许福年、南通达志陆、南通顾兰荪等友人和昆山周季藩、吴县潘志诜、常熟王开化、陈绍贤、吴县潘承聪、昆山龚乘龙、吴县彭清裕、常熟周庆凤、吴县袁礼贤、昆山朱文骥、吴县袁肇甲、吴县赵善昌、常熟郑之骏、常熟叶云贵、吴县吴延费、昆山余天遂等学生。

10月出版的《国学丛选》第十一集“经类”刊出《读左绎谊(续)》;“文类·文录”刊出《陆少唐先生遗诗叙》;“文类·诗录”刊出《大雪节盆兰发一枝》等二十一首。金天翻(松岑)也在“文类·诗录”刊出《石子画梅天遂作书同时相赋诗以报之》;余天遂在“文类·诗录”刊出《石子夫

子过我家旧宅南溪草堂寄我以诗依韵和之》与《题石子夫子近游图》。

11月,同学挚友张景云(1868.4.7-1919,原名兆荣,改名庸。昆山蓬阁镇人。学识渊博,文才横溢,尤以诗见长,连清末状元张謇亦自叹“文不如方惟一,诗不若张景云”,曾延之教其子孝若。又聘其任南通图书馆馆长兼南通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客逝南通,作《哭景云诗》五律四首和《再吊景云》七律一首,其五律第二首:南州张季子(謇),生死不忘君。宾馆十年席,剑山三尺坟。此才真磊落,作鬼亦芳芬。他日渡江去,悲歌表墓文。并撰《张景云哀词》与《张景云遗诗序》,刊于1920年10月出版之《国学丛选》第十二集。

撰《余少英先生诗书册跋》。

余天遂撰《胡太师母谢太夫人九十寿序》,刊于当年十二月出版之《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文录”。

先生每月必归家探母一次,每次回家总见白发苍苍的老母走出门外,倚闾企望,盼儿心切。于是请友人绘《门间倚望图》,并征题咏,以寓孺慕之情,稍解平日之相思。

十二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诗录”刊出《记游(因省立各校联合运动会事赴江宁)》等二十九首。同集“诗录”刊出湖南醴陵傅熊湘的《题胡石子门间倚望图》。

民国九年(庚申) 1920年 53岁

春,方惟一自南通来,与先生相聚,并同宿城外旅馆,先生赠方氏五绝四首,别后又寄惟一诗七律三首于南通。

俞金门赠七古一章,极推崇先生画梅,先生以诗答之。

撰《松窗琐话》,陆续刊载于《小说新报》杂志“谈海”栏。

同年在《游戏新报》杂志发表诗、词和谜语。

七月,柳亚子书赠《题石子倚闾图》七律一

首。

社友傅钝安也书赠《题石予门间倚望图》七律一首：孝可传家俭可师，半兰庐舍日迟迟。为图一慰平生意，九十亲娘五十儿。五十年来儿有孙，儿心不改恋亲恩。儿行未远归须早，怕见归迟母倚门。

初秋，获山水画家平湖徐铨绘赠《门间倚望图》并五绝一首。

幼子昌治入苏州三元坊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读书，并借住大太平巷72号先生文友家。

秋，绘红梅册页，赠学生郑逸梅。

10月出版的《国学丛选》第十二集“经类”刊出《读左绎谊（续）》；“文类·文录”刊出《张景云遗诗叙》与《张景云哀词》；“文类·诗录”刊出《哭昌会儿》与《归舟口占》。

12月23日南社柳亚子、陈去病、费公直、王大觉等十多人聚集周庄德记酒店，诗酒兴会，酬唱“迷楼诗”，并索社友唱和，石予收阅并立即吟和，翌晨寄返，亚子讶其神速，以“八叉七步”（八叉指温庭筠八叉手成八韵，七步言曹植七步成诗）盛赞。

民国十年（辛酉） 1921年 54岁

1月6日（庚申年小寒）获广州檀度庵比丘尼古溶（谈月色，1891-1976，原名古溶，更名月色，广东顺德人。四岁被送至广州檀度庵寄养，十五岁削发为尼，精琴棋书画，还俗后由高天梅、程大璋作媒，1922年嫁与蔡哲夫为侧室，系著名书画篆刻家。）绘赠《门间倚望图》一帧。

初春，寄诗予上海门人余天遂。

二月，俞金门题赠《门间倚望图》古风一首。

春末，带领学生远足，三游杭州西湖，撰纪游诗十八首。

老友金鹤望题赠《门间倚望图》七言长律一首。

陆续在《消闲月刊》发表《半兰旧庐随笔》

《梅花诗话》《海棠诗话》《画梅赘语》，在《游戏世界》杂志“谈荟”栏发表文稿。

幼子昌治小学毕业后，考入太仓江苏省立第四中学。

秋间在草桥中学教师宿舍东庐手抄节录学生吴兴沈家骧所藏抄本《鲟灯漫笔》八卷（清乾隆时吴江屠拱垣著）和《庀下长语》（清乾隆时吴江汝阶玉著）。

青浦诗人沈瘦东游苏州时拜访先生于东庐，后在其《瓶粟斋诗话》中有评述先生诗条目。

在家宅半兰旧庐后（西）辟数弓地为花圃，并雅称一侧傍两树高梧之房屋为“听秋小筑”，请门人周季蕃刻《听秋小筑》印。

胞妹（嫁本镇里泾张仲甫）亡，作悼妹诗五律三首。

深秋装裱墨梅，贻学生郑逸梅。

民国十一年（壬戌） 1922年 55岁

1月5日（辛酉年小寒前一日），社友湖南湘乡李涤（字汝航，号散木，民国时期长期在吴江县警察所任警佐，擅书画诗文）绘成《近游图》，十一天后逢大雪纷飞，又在画上呵冻题写五言古风一首后赠先生，其古道热肠可见一斑。

2月，幼子昌治在江苏省立太仓中学读了一学期后，转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中学（草桥中学）就读，成了父亲学校的学生。

社友湖南岳阳李洞庭题赠《门间倚望图》诗一首，洞庭，名澄宇，民国“湘中五子”之一，著名诗人和国学文史学家。

获太陵袁克权书赠《胡母谢太君倚闾图赞》一篇，克权（1898-1941），字规庵，号百衲，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第五子，一生以文墨自娱。

三子昌才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即在该校附属小学任教。

秋季出版的《国学丛选》第十三、四合集“经类”刊出《读左绎谊（续）》；“文类·诗录”刊

出《虎跑寺》《偕君默公亮至汪氏环翠山庄》等十六首。金天翻(松岑)也在“文类·诗录”刊出《题胡石予倚庐图》;高燮(吹万)在“商兑通信录”刊出《答胡石予书》。

在《小说新报》《快活》杂志发表诗文。学生郑逸梅也在《快活》杂志发表《胡石予之轶事》。

自1912年起至1922年的十多年之中,仅目前所知先生获得《近游图》近二十帧、题耑数帧、序三篇、诗三十余首、词近十阙。

自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至民国十一年(1922)十三年间共作诗1500余首,冬整理删定482首,编为《半兰旧庐初删稿(诗)》五卷,十二月请老友金天翻(松岑)为之作序。

撰《读松岑天放楼诗集》七律一首。

民国十二年(癸亥) 1923年 56岁

老友高吹万题赠《门间倚望图》五律一首。

三月初七日(4月22日),母谢太夫人逝世于家中,享年九十四岁,因悲痛,废吟事半年。

倩友刻《冬夏读书春秋游览》印。

在《小说日报》《绿竹》《半月》《最小》《心声:妇女文苑》等刊物上发表诗文。

十二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文录”刊出《古梅记》等二篇;“诗录”刊出《题松岑天放楼诗集》《舟行》等十四首。同集“诗录”还刊出湖南醴陵刘泽湘(字今希)的《题石予近游图》。

自1919年起至1923年的数年中,仅目前所知先生获得《门间倚望图》近十帧、题耑数帧、诗近十首。

三子昌才赴沪出任商务印书馆所属尚公小学校长,是时开始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教育论文。

民国十三年(甲子) 1924年 57岁

梅花时节,金松岑召集吟友虎丘冷香阁雅集,先生因事羁不赴,乃挑旧绘墨梅一帧并作七律诗一首寄之。

二月,在草桥学舍作《半兰旧庐诗稿自

序》。

老友高吹万欲资助刻诗集,先生婉谢拒。

4月出版的《国学丛选》第十五、六合集“文类·文录”刊出《古梅记》与《祭骨骸文》;“文类·诗录”刊出《题松岑天放楼诗集》等八首。高吹万也在“文类·诗录”刊出《胡石予属题门间倚望图》。

继续在《绿竹》、《半月》等刊物上发表诗文。

四月,作《示儿辈》七页长信,淳淳教训子孙即便富足也要艰苦励志,节俭治家,自奉不当厚,待人不可薄。后由三子昌才装裱成册,门人周实署为《石予夫子家言示范》。

撰《周伯玉传》。撰《缥缈史》,署名闲主人,上海竞智图书馆刊行。

时先生画梅声望已高,市面上已有伪作,一王姓学生(溧阳人)购得署先生款之墨梅轴,以示先生,知是赝品大为懊丧,先生即在画上补绘墨梅一枝,并题绝句两首以慰之,王生遂笑逐颜开。

八月间,半兰旧庐后圃中梅树竟然开花,并陆续开放至九月份,当时梅叶未尽凋落,乃作梅花图时缀以残叶,创空前未有之画稿,并撰《八月梅花记》。

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昆山地处战争前线,为直系军队总兵站、巡帅齐燮元驻节地,过境军队劫掠奸淫烧杀,祸及全境,战祸最烈,损失惨重,给昆山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蓬阁当昆、太、嘉三县之要冲,嘉定方向难民蜂拥而来,地方人士在南北两校设立临时收容所,收容难民五千多人,门生邵汝干主其事,长婿陶公亮辅助之。先生后赴沪避难,目睹兵灾后家乡惨状,非常痛心,作《捉船行》、《捉人行》、《哀难民》、《观嘉定西门外战地》、《劫后》等战争记事诗十一首,表达了对兵灾地民众的深深怜悯和对军队恶行与发起战争之罪魁祸首的无比愤慨与谴责。

民国十四年(乙丑) 1925年 58岁

在新创刊的《新月》杂志第2期发表《游拙政园记》。

家乡稻田发生螟虫灾害。

七月初七日(8月25日),南社发起人、友人高天梅卒,年仅四十五岁,撰挽联悼之。

秋,方还至学校看望先生,遂在先生宿舍“东庐”过夜,竟夕长谈,诗相唱和。

民国十五年(丙寅) 1926年 59岁

在新创刊的《紫罗兰》杂志第20期发表《离恨集》。

春夏连获两孙(其中三子昌才的长子思服生于七月),家人中十二生肖齐全。孙女思服(次子昌学的幼女)生。

7月,幼子昌治中学毕业,成为江苏省立第二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并考入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

携长孙思屯至苏州读书。

孙思豫(次子昌学的次子,乳名乐和)患痢疾六岁殇。

撰《王宗健传略》。

民国十六年(丁卯) 1927年 60岁

与幼子昌治、长孙思屯及李达同赏高顶周氏梅花,撰《观梅记》。既而周氏欲筑屋,移梅至先生家,先生画梅会装池赠周氏,悬诸堂中,俾使常留意态萧疏之清影。

春,大病几殆,卧休家中三个月。

6月,全国教育实行大学区制,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高中部合并组建第四中山大学区苏州中学,汪家玉辞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职。人事变动,先生遂辞去草桥中学教职,并将在苏州历年所购贮藏于草桥中学宿舍的近万卷书籍雇船运回家乡蓬阊镇半兰旧庐。在草桥中学执教二十馀年,授课循循善诱、语言精湛、兴趣盎然,吸引学生聚精会神听讲,诗文写作强调联系实际、独抒己见,反对堆砌词藻、内

容空洞,教学效果显著,是全校师生公认最好的老师。门生弟子遍天下,学生中英才辈出,叶圣陶、顾颉刚、吴湖帆、王伯祥、江小鹈、蒋吟秋、范烟桥、郑逸梅、顾廷龙等一代硕彦均沐受过他的教泽。

撰《赠佩诤》七律一首,佩诤为王謇之字,乃我国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和学者,时任振华女中副校长。

在上海《联益之友》美术旬刊发表绘梅美术作品。

三子昌才出任新组建的第四中山大学区苏州中学(次年改称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师范科主任。

民国十七年(戊辰) 1928年 61岁

陆续在《紫罗兰》杂志发表诗文。

在《联益之友》美术旬刊发表绘梅美术作品和《画梅赘言》(连载)。

夏,胃疾剧发,又辞去私立苏州振华女中教职,结束教师生涯,息影乡园,筑“容膝轩”以居。

撰《黄映斋家传》。

镌《草桥旧客》印。

三子昌才居南京,迎先生小住,遍游名胜古迹,晤卢彬士、方惟一、李仲霞,惟一索先生红梅。

三子昌才侍先生游扬州,访平山堂,谒梅花岭史可法墓。至苏州,访振华女校旧友,时振华新校舍落成,求画盈丈梅花,先生擅袖挥毫,顷刻而成,并题诗其上。

约此年秋冬加入常熟诗文社——虞社,同年起在社刊《虞社》上刊出多篇诗作。

孙女思兑生。

仲秋,在听秋轩偶画兰石,贻学生郑逸梅。重阳后三日(10月24日)绘墨梅折扇赠郑逸梅。

国民政府拟定梅花为国花,冬请弟子周季蕃刻《国花》印。

先生在吴门二十馀年,因求画者众多,又

无名家架子,索者必应,故平均每年绘梅花画五百幅以上,其自喻总计绘梅花画逾万帧。

民国十八年(己巳) 1929年 62岁

学生郑逸梅去岁迁居沪上,初春画红梅立轴为赠。

继续在《联益之友》“艺术世界”栏连载《画梅赘言》十多篇和发表诗作。

继续在《紫罗兰》杂志发表诗作。

继续在《虞社》上刊出诗作。

樊少云、赵眠云、郑逸梅谋为先生印诗集,先生却之。

太仓中学校长高薪聘先生任教,先生婉拒。

孙女思萃(三子昌才的长女)生。

民国十九年(庚午) 1930年 63岁

驾舟至玉山之阴,采残石大小数十以归。

6月17日,门人余天遂病故,年五十二岁。

六月,赴太仓南门外雪葭泾,登管家风月楼,撰《快翁补梅草堂诗存序》。

夏日,搜集整理少时文友杨珍诗稿为《雪庐残稿》,八月又撰《雪庐残稿序》。

吴氏女甥琛宝歿,撰诔辞。

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夫人曹桂贞患肺炎卒,年六十三岁。作悼亡诗十五首,请挚友方还作《胡妇曹夫人传》、高吹万撰《胡君石予元配曹夫人墓志铭》(发表于1931年《联益之友》第177期和1936年《虞社》第223期)。镇西北二里有座鹤颈湾桥,毁于四十年前,乡民来往绕行很不便,但一直苦于无资金重建,曹夫人省吃俭用,欲出私蓄造桥,以方便来往群众。事未成而夫人病逝,先生成全夫人遗愿,与诸儿捐出胡夫人遗金千元建造石桥,并撰刻桥铭:“断桥孔道,鹤颈之流。遗金重建,夫人千秋。夫人之夫,铭兹功修。”桥成后乡人称颂为“胡夫人桥”。

继续在《联益之友》“艺术世界”栏连载《画梅赘言》二十多篇和发表诗作。郑逸梅也在《联益之友》“名人轶事”栏发表《诗人胡石予先生

之悼亡》。

继续在《虞社》上刊出诗作。

民国二十年(辛未) 1931年 64岁

1月幼子昌治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1926-1927年大革命期间东南大学停课近一年,1927年9月开学已改名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又更名国立中央大学,三年半修完学分提前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由三子昌才介绍至南京汤山农民教育馆编写刊物《农民教育》。后又至江苏省立太仓中学任教国文和英文。

继续在《联益之友》“艺术世界”栏连载《画梅赘言》。

《联益之友》第174期(1931年)刊载余天遂遗作《胡太师母谢太夫人诔词》。

三子昌才出任上海市教育局第三科(小学教育)科长(后任专员,至1937年上海沦陷。同时兼任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教授、《申报》教育栏编辑、《新闻报》教育栏编辑、《儿童晨报》主编、商务印书馆小学教课书编辑主任等职)。

赴沪小住。

夏日,撰《快翁小传》和《唐霭峰传略》(霭峰为同学唐颂文之父)。

为蔡哲夫夫人谈月色创作的《月色梅花册》题咏。

为学生郑逸梅题梅花图。

十二月,为社友岳阳李洞庭作《书〈月下桔槔图〉后》,洞庭祖父母茹苦耦耕,天旱汲水往往达夜半,为纪念先祖、传示子孙,请人绘《月下桔槔图》,先生读李氏自序后大有同感,欣然命笔。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 1932年 65岁

淞沪抗战爆发,全家赴上海避难。

撰《画梅新话》《六圃记》和《半兰旧庐记》。

4月10日,老友方还(惟一)卒于南京,享年六十六岁。

8月7-11日与三子昌才、孙思旅(昌才长

子,乳名俭和)游莫干山和西湖。9日上午拜访居住在莫干山别墅(六月息居)的周梦坡(1864-1933,名庆云,字景星,浙江吴兴南当人,著名实业家、学者、诗人、书画家、古琴家和收藏家),交谈甚欢,蒙赠其编纂的《莫干山志》,当夜灯下作诗答谢。

10月9日,孙思升(三子昌才的次子)生。

在《珊瑚》杂志第1卷第9期发表《乱离杂诗》,在《旅行杂志》第6卷第10期发表《莫干山纪游(附湖上纪游)》。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1933年 66岁

元旦,幼子昌治与幼媳陶妃白在上海远东饭店举行婚礼,证婚人为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主婚人为先生,致辞一小时,强调节俭勤劳。

撰《炙砚诗话》和《半兰旧庐丛话》。

赴沪晤高吹万。

4月30日至5月5日与三子昌才同游杭州西湖。

幼子昌治由三子昌才介绍相继至上海浦东中学、真如国立暨南大学实验中学任教。

11月5日(立冬前二日)菊花盛开之际,长孙思屯为先生在家宅花圃靠竹篱笆的菊花旁摄一立像。

11月29日,孙女思蒙(幼子昌治的长女)生。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 1934年 67岁

在《文艺捭华》杂志第1卷第1期发表《古梅记》,在《新上海》杂志第1卷第9期发表《画梅题记》,在《旅行杂志》第8卷第5期发表《湖上四日游记》。

重读史书,将重要典故逐一摘录,积成数册,成《记事珠》,以供写作时参考。

4月,幼子昌治由三子昌才介绍至上海市卫生局任第一科卫生教育股主任科员。

患丹毒,当时镇上无西医,幼子昌治适在上海市卫生局工作,遂请好友王世伟博士至蓬阁家中医治,虽数度出现危状,然都能转危为

安。

12月15日,孙思震(幼子昌治的长子)生。孙女思兑亡,撰《哀女孙思兑文》。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 1935年 68岁

1月18日,孙女思健(三子昌才的次女)生。

在《文艺捭华》杂志第2卷第2期发表《病中口占》。

赴沪就医治疗丹毒,在南市董家渡上海医院施行手术,不幸伤及右足筋骨致此足不能行走。学生郑逸梅前往探视,笔录先生口述七律四首。出院后在三子叔异家(蒲柏坊)调养,不久由叔异雇船护送返蓬阁家中,离沪时郑逸梅前往送行。

三子昌才在上海创办私立国华中学,任董事长,校址在沪西北戈登路(今江宁路)、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口。

7月,幼子昌治出任上海私立正风中学校长,校址在姚主教路(今天平路)。

冬至后又大病。

余天遂子余元良,年方弱冠抱病而亡。撰《余天遂遗稿序》,又录天遂诗入《蓬溪诗存》。

书赠同学《唐北隐七十诗》,北隐为唐颂文之号。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1936年 69岁

三子昌才为先生制作一辆可以推行的竹篮舆,有时由晚辈推至家附近观赏田园风光,但生活上殊为不便,很是痛苦。

在半兰旧庐后(西)改建南向小庐(平房),方便病足的先生居住。

在《虞社》“同岑文集”、“同岑诗集”上刊出诗文。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 1937年 70岁

自号老跛。

同学唐北隐卒,撰《北隐小传》。

3月24日,孙思晋(幼子昌治的次子)生。6月12日,孙思颐(三子昌才的幼子)生。

幼子昌治因积极支持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正风中学成为民主堡垒,同时参加中共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为“上海著作人协会”发起人之一,五月被国民党教育行政当局撤职并勒令离沪。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蓬阁频警风鹤,先生由家人扶避陈墓(今锦溪)镇。作诗多首,成《锦溪集》。九月十日摔一跤,致左足亦受重伤。

冬,又与长女昌明全家、幼子昌治全家一起乘船沿长江西上,行至安徽铜陵境内章村附近时,先生不愿继续西行,嘱昌治上岸寻找暂避之处,昌治经多方寻觅,找到章村一家乡绅章惠民(前清秀才)家,章氏亦久仰先生大名,欢迎先生寓居,先生乃与两位家仆一起留在章村暂住,时为12月14日。

昌明全家不愿西行返回上海。而昌治率其全家继续西上辗转皖、赣、鄂等省,最后入川投身革命事业。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 1938年 71岁

先生寓居章村后,虽行动不便,但仍与章惠民、章海秋、章筱山、朱云衡诸位当地文人诗文唱和,聊以遣愁,成《章村诗存》二卷,一卷为《乱离诗》,另一卷为《题画梅诗》。并常画墨梅题诗款酬人。

后章村遭烽火,乃移至山中寓何本荣家,何氏慕先生诗名,殊优礼待。

先生自撰墓志铭。

三子昌才应云南省教育厅之聘,出任云南省立昆华实验小学校长。

先生因患细菌性痢疾,当地无医药及时治疗,8月28日巳时(上午9-11时)病故于何宅。

由于战乱频繁,路途遥远,遗骸暂存铜陵。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 1939年

8月28日先生逝世一周年忌日,门生故旧

高吹万、范烟桥、郑逸梅、赵眠云发起公祭于上海法藏寺,参加者有包天笑、吴粹伦、庄畏仲、姚石子、高介子、蒋吟秋、徐平阶、谢闲鸥、姜可生、丁惠康等数十人,均海上文化名流。收到挽联、挽诗甚多,表达了学术界、文艺界和教育界的一片痛惜、敬仰和缅怀之情。其中高吹万、吴铁城和舒新城、金兆梓合挽的三联最为人称道,高吹万:“先生为四十年道义文字至交,如此风规谁克继;笥篋有千百首手写遗诗原迹,于今劫后幸犹存。”吴铁城:“廿年讲学追炎武;万首删诗比放翁。”舒新城、金兆梓:“行谊类郭有道王彦方,居江海而潜身,默化乡邦如时雨;诗才追范石湖陆务观,写田园以托志,别开蹊径见高风。”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 1947年

先生逝世九年后,先生幼子胡昌治赴铜陵将遗柩运回蓬阁镇,与妻曹桂贞棺木合葬在镇南郊祖坟。

注:文中日期,汉字为农历,阿拉伯字为公历。

1983年先生高足郑逸梅老先生曾编《昆山胡石予先生年表》,功莫大焉,然因年代久远,考证困难,间有遗漏舛误。笔者与胡石予先生为蓬阁同乡,自幼赁居在蓬阁镇北街石予先生长婿陶公亮家房屋长大,陶氏次女陶世静老师系笔者先母周祥珍老师的小学同事,又是笔者启蒙师。笔者成年后,因收集乡邦文献,与石予先生幼子胡昌治先生(1907-2005,红军老干部)成为忘年交,又面谒石予先生高足郑逸梅先生,获益良多。浸淫胡石予与南社研究三十多年,遂不揣学植浅薄,在郑逸老《昆山胡石予先生年表》的基础上,参阅大量相关资料(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勉力编成先生年谱,以丰富南社学研究,诚冀抛砖引玉,并祈大方之家指谬斧正。

(作者为苏州市南社研究会理事)

记顾翼东旧藏《王同愈诗书卷》

□ 李 军

二〇一一年末，沉寂多年的《吴郡文编》手稿二百四十六卷、八十册，终于影印行世，这无疑为苏州文化史又一个新的亮点。从清道光七年（1827），顾沅完成《文编》的编纂工作，至此已近两百年，其间这部珍贵的手稿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满清民国易代、八年抗战及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等，一度曾失而复得，经过几代顾氏后人的精心护持，才使得这部巨著完好地流传于世，归诸公藏，惓惓乡梓之情，一代代延续着。《文编》稿本的影印出版，完成了从顾翼东先生以下几代人的夙愿，其后人顾其威先生继承前辈保存乡邦文献、无私奉公的美德，又将家藏《王同愈诗书卷》，捐赠苏州博物馆，为顾氏一族与苏州博物馆之间再添佳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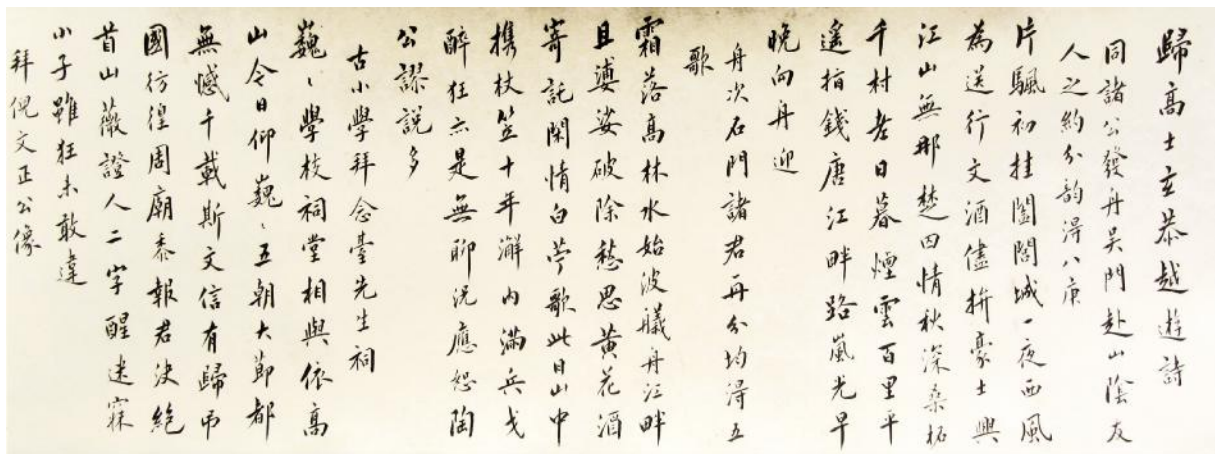
王同愈（1856—1941），字文若，号胜之，晚号栩缘。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任顺天乡试考官、湖北学政、江西学政等。清末民初，隐居上海南翔仙槎桥。抗战爆发后，退居上海租界。著有《栩缘文存》、《诗存》、《栩缘日记》、《栩缘随笔》等。后由顾廷龙先生编辑整理为《王同愈集》，公开出版。

出身翰林的王同愈，早年追随吴大澂，精于鉴赏考订之学，并工书擅画，曾参与怡园画社的雅集活动，家中有栩栩盒藏书。其书法源出欧、褚，据顾廷龙《王同愈集》序云，王氏手稿历经战乱，散佚无存。顾氏所藏《王同愈诗书

卷》，虽是他随笔之作，但融赏鉴、临摹、考证于一卷，寄托了对女儿女婿的爱护之情，其价值自不容轻视。

关于此卷全面的品评，见于卷后叶景葵所作题跋。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号卷盒。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曾入赵尔巽幕府，代草《条陈十策》。庚子国变后，愤于内忧外患，弃官经商，走上“实业救国”道路。创建浙江兴业银行，并担任董事长。纠合同仁，创办私立上海合众图书馆，以藏书捐存馆中。著有《卷盒藏书记》、《卷盒书跋》、《卷盒杂著》等。叶氏生前，与王同愈为至交，其题跋云：

此卷为王公栩缘随意临池之作，时在宣统辛亥江西提学任内，以赠女夫顾君浩臣。共分五段，第一录归玄恭《越游诗》九首，原题画竹卷后，汉阳叶氏所藏，盖读画时抄存者。第二临唐碑三种，一王居士砖塔铭，二皇甫诞碑，三孔子庙堂碑。公之书法道源率更，上规永兴，以王孝宽兼欧、虞、褚三家之法，习之最久。公曾得砖塔铭精拓本三本，为灵芝一块本、说罄整本、说罄残本，皆川沙沈氏秘笈，所谓取法乎上，故前后跋语郑重言之也。第三说吴中方言，一释孛姿，二释鼈，三释疰，四释瘡，以字书、韵书参互考证，绝无穿凿，得其真谛，与栖霞郝氏《证俗文》殆相伯仲。第四



王同愈诗书卷(之一) 苏州博物馆藏

临唐碑三种,均未详。第五题张茶农石公山画卷七绝六首之三,当因纸幅已尽,故中辍也。

公弱冠以善书名,所作随手散佚。国变后,卜隐南翔,屏绝外缘,不履城市。丁丑之难,百物荡然,故传世书画绝少。公任苏路协理时,余屡接温霁,以后踪迹阔疏。丁丑相逢道故,颇思求得书翰,公亦欲作画赠余,因循未果。岁月如流,人天永别,不胜怆然。丙戌二月,公外孙翼东示以此卷,文、诗、书三绝,萃于丈幅之中,想见其俯仰琴书,夷犹淡定。玄恭吊蕺山云,五朝大节都无憾,千载斯文信有归,不啻为公咏焉。展诵再三,殊深高山景行之慕。后学叶景葵敬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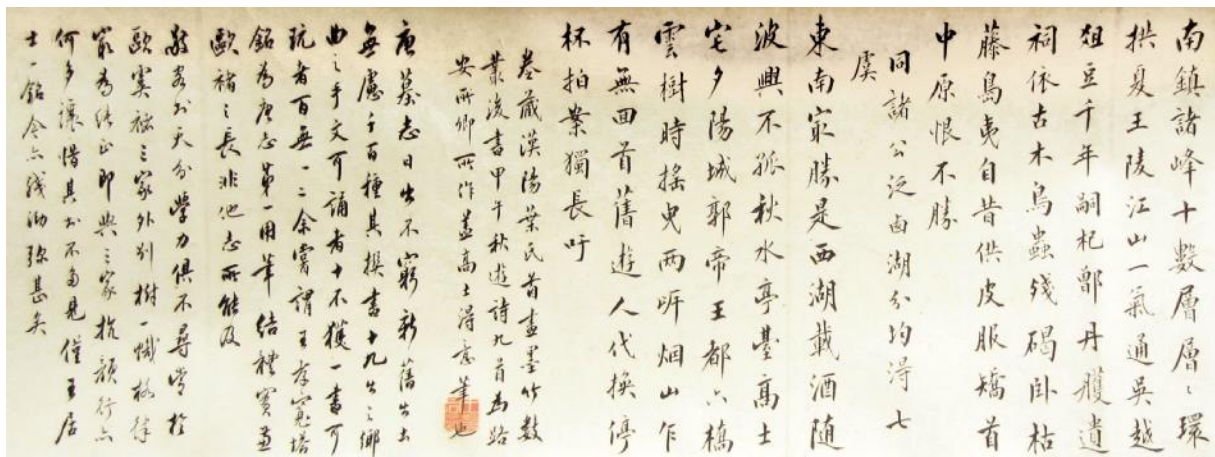
按:丙戌为民国三十五年(1946),从上文可知,这个长卷是王同愈在宣统三年(1911)任江西学政期间陆续所写,因为女婿顾浩臣喜欢,所以就赠予他。顾浩臣名瀚昌,即顾翼东先生之父,早年肄业苏州中西学堂,于民国十九年(1930)去世。顾翼东(1903-1996),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一九二三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返回东吴大学任教。旋又攻读芝大博士学位,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等校教授。一九五二年,转入复旦大学任

化学系教授,直至去世。顾沅为顾翼东高祖,《吴郡文编》成书以后,一直保存于顾家,因苏州经历太平天国之乱,书稿于同治二年(1863)散失,五十六年之后,经孙伯南告知,顾瀚昌才从上海藏书家王培孙处,将原稿购归。个中原委,详见民国八年(1919)王同愈所作《吴郡文编》题跋。

从叶景葵的题跋可知,此卷共分五段,第一段王氏临写《归高士玄恭越游诗》九首,并缀跋云:

卷藏汉阳叶氏,首画墨竹数丛,后书甲午秋游诗九首,为路安卿所作,盖高士得意笔也。

按:此卷今题作《墨竹诗翰卷》,除归氏画墨竹五段、写诗九首外,后有两人好友顾炎武题诗,以及清嘉道、同光间诸家题跋^[1]。汉阳叶氏即叶名澧(1811-1859),字润臣,湖北汉阳人。叶志诜之子。此卷从叶氏流出后,递藏梁鼎芬、余绍宋两家,今归浙江省博物院。为清顺治十四年(1657)归庄为好友路泽溥所作。王氏《栩缘随笔》中有“归高士画竹附越游诗卷”一条^[2],全文抄录归氏诗、顾炎武和作及吴昆田、宗稷辰、韩印、钟鼎、杨传第诸家次韵之作。《栩缘日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廿一日记云:“灯下录归高士《越游诗卷》。”^[3]未知即此卷之首段耶?



王同愈诗书卷(之二) 苏州博物馆藏

第二段为临唐碑三种，依次为：《王居士砖塔铭》(七行)、《皇甫诞碑》(十一行)、《孔子庙堂碑》(十七行)。《砖塔铭》一段前有王同愈题小序云：

唐墓志日出不穷，新旧出土无虑千余种，其撰书十九出之乡曲之手，文可诵者十不获一，书可玩者，百无一二，余尝谓王孝宽《塔铭》为唐志第一，用笔、结体实兼欧、褚之长，非他志所能及。

敬客书天分、学历俱不寻常，于欧、虞、褚三家外，别树一帜，格律最为纯正，即与三家抗，颜行亦何多让，惜其书不多见，仅王居士一铭，今亦残泐弥甚矣。

塔铭临本凡七行，其文曰：“芝制文，敬客书 / 人也，英宗颖迈 / 魏，乐府歌其载 / 烦翫缕，居士 / 坟典备穷义 / 得给园之 / 勤”，这一页为《砖塔铭》右下角残石，恰好与西泠拍卖二〇一二年秋拍中，吴湖帆、冯超然等题《王居士砖塔铭》集拓前所装王同愈临铭文(“大唐”一块)一页^[4]，上下相接，因此颇疑系王氏先后所临，而分散两处者。此本王氏缀跋云：

《砖塔铭》出土即裂，世无完本。“说罄”以下整拓已不多见，“灵芝”至“剋勤”一角，则稀如星凤矣。余得川沙沈氏藏本，有此一角，摹榻极精，可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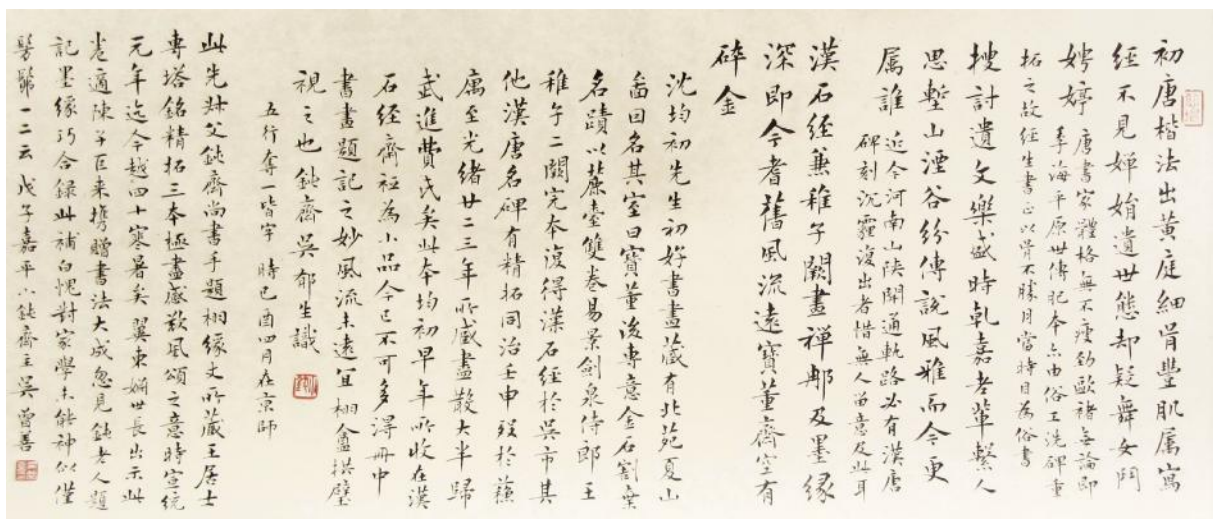
按：《栩缘文存》卷一有《砖塔铭跋》，缕述塔铭

拓本之先后外，庐陈亲眼所见川沙沈氏所藏《砖塔铭》两种，后一种即归于王氏，其临本所据之底本也。^[5]与本卷王氏跋文所述合：

余所藏《砖塔铭》系沈韵初内翰旧物，综三拓本为一册，前列翁大年所跋“灵芝”一角三十三字，次列“说罄”整本，有张解元叔未题跋。后列“说罄”残本(上半截十一行，行七字)，有丁龙泓题字。两“说罄”本原为赵素门、次闲父子所藏，当时已珍如拱璧矣。阮文达题嘉泰本《施顾注苏诗》，谓当以张三世论之。余谓此《塔铭》亦当以张三世论之。“灵芝”一块及“说罄”整本为所见，初裂全本为所闻(近时藏家矜为秘笈者，皆已刻耳)，未裂全本为所传闻。石既出土即裂，安得有此，止可谓之所传闻异词尔。

按：沈树镛(1832-1873)，字均初，号郑斋。松江川沙(今上海松江)人。清咸丰九年(1859)举人，官至内阁中书。收藏碑版，甲于江南。著有《郑斋金石题跋记》。以上题跋四段，后三段经王同愈合并润饰，收入《栩缘随笔》，末云“其子肖韵明经，丁酉年应试北闱，出石余斋，顿触所好，因以百金相易，遂为余有”。^[6]由此可知，王同愈之得沈树镛旧藏《砖塔铭》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据《栩缘日记》本年六月十六日云：

答谒沈肖韵，出示其尊甫韵初先生所



王同愈诗书卷(之三) 苏州博物馆藏

藏《王居士砖塔铭》旧拓残本三种。……目光片羽，良足珍秘，遂借归与缘督共赏之。且约钝斋、需斋、及厂同赏之。^[7]

同年八月廿四日记云：

下午出门拜客。访肖韵谈，并向求《砖塔铭》，由文篋介绍，以三十金易之（值百金云）。^[8]

然则王氏之得《砖塔铭》在此时。据《栩缘随笔》所记，此后还有九条涉及《砖塔铭》，或援引前人之说，或评鹭时人之论，殊途同归，大抵以为《王居士砖塔铭》兼欧、褚之长，“实从《龙藏》、《启法》来也”^[9]。其中，第七条按《砖塔铭》之破损程度，将先后拓本分成九期，依次罗列考据点^[10]，足见其对此铭之用心。殆栩缘老人之书，亦取法于斯，是以推崇备至。

而此卷叶景葵题跋之后，有吴曾善题记，手录其叔父吴郁生题栩缘藏《王居士砖塔铭》跋云：

初唐楷法出黄庭，细骨丰肌属写经，不见婬娟遗世态，却疑舞女斗娉婷（唐书家体格无不瘦劲，欧褚无论，即季海、平原世传肥本，亦由俗工洗碑重拓之故，经生书正以骨不胜肉，当时目为俗书）。

探讨遗文乐盛时，乾嘉老辈系人思。

初唐楷法出黄庭，细骨丰肌属写经，不见婬娟遗世态，却疑舞女斗娉婷。
 唐书家体格无不瘦劲，欧褚无论，即季海、平原世传肥本，亦由俗工洗碑重拓之故，经生书正以骨不胜肉，当时目为俗书。
 搜讨遗文乐盛时，乾嘉老辈系人思。
 思整山湮谷纷传说，风雅而今更属谁。
 近今河南、山、陕开通轨路，必有汉唐碑刻沉霾复出者，惜无人留意及此耳。
 属谁。
 汉石经兼稚子阙，画禅那及墨缘深。
 即今耆旧风流远，宝董斋空有碎金。

碎金

沈均初先生初好书画，藏有北苑《夏山图》，因名其室曰宝董。后专意金石，割弃名迹，以麓台双卷，易景剑泉侍郎稚子二阙完本，复得汉石经于吴市。其他汉唐名碑，[皆]有精拓。同治壬申，歿于苏寓，至光绪廿二三年，所藏尽散，大半归武进费氏矣。此均初早年所收，在汉石经斋只为小品，今已不可多得。册中书画题记之妙，风流未远，宜栩庵拱壁视之也。钝斋吴郁生识。

整山湮谷纷传说，风雅而今更属谁（近今河南、山、陕开通轨路，必有汉唐碑刻沉霾复出者，惜无人留意及此耳）。

汉石经兼稚子阙，画禅那及墨缘深。即今耆旧风流远，宝董斋空有碎金。

沈均初先生初好书画，藏有北苑《夏山图》，因名其室曰宝董。后专意金石，割弃名迹，以麓台双卷，易景剑泉侍郎稚子二阙完本，复得汉石经于吴市。其他汉唐名碑，[皆]有精拓。同治壬申，歿于苏寓，至光绪廿二三年，所藏尽散，大半归武进费氏矣。此均初早年所收，在汉石经斋只为小品，今已不可多得。册中书画题记之妙，风流未远，宜栩庵拱壁视之也。钝斋吴郁生识。

按：吴郁生（1854—1940），字蔚若，号钝斋。吴县人。嘉庆七年（1801）状元吴廷琛之孙，光绪三年（1877）进士。官至礼部尚书、邮传部尚书。晚年隐居青岛。题记后缀有小注云：“五行夺一皆字。时己酉四月，在京师。”己酉为清宣统元年（1909），距王同愈之得《砖塔铭》拓本已逾十二年，仅早于王氏临写此卷两年。今王氏旧藏拓本不知归于何处，吴氏题记记其渊源，并垂久远。其中，谈到川沙沈氏斋名宝董室、汉石经室

之由来,又言及沈氏身后,藏品多归武进费念慈,皆可备一时之掌故。

在吴郁生题记后,有吴曾善附记一段。吴曾善(1890-1966),字慈堪,号小钝。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堂,后担任律师,曾任律师公会会长,为国民七君子辩护。其书学得叔父吴郁生指授,初学欧体,转法唐人李邕。一九四九年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其跋云:

此先叔父钝斋尚书手题栩缘丈所藏《王居士砖塔铭》精拓三本,极尽感叹风颂之意。时宣统元年,迄今越四十寒暑矣。翼东姻世长出示此卷,适陈子巨来携赠《书法大成》,忽见钝老人题记,墨缘巧合,录此补白,愧对家学,未能神似,仅仿佛一二云。戊子嘉平,小钝斋主吴曾善。

从文中所述,可知吴曾善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二月,从顾翼东处见到此卷,恰好陈巨来拿《书法大成》赠他,看见其叔父题记,遂移录卷末,略补数行,记述个中因缘,可谓巧合之极。按:陈巨来《记十大狂人事》中白蕉一条有云:“余与之相交最晚,解放后在平襟亚衡先生座中始相识,时平君以《书法大成》稿本求白为审定者。”^[1]内中时间,或系误记。平氏《书法大成》不分卷,收录王同愈樵砖塔残碑、王同愈樵王敬客书砖塔铭、吴曾善中楷范字、王同愈评王敬客书砖塔铭、吴郁生题王敬客书砖塔铭等,吴曾善所谓叔父题跋,即末一种。《书法大成》一书,目下通行本为民國三十八年(1949)中央书店影印本,而最初印本则由万象图书馆(一名万象书屋)于民國三十七年(1948)十二月出版,但由于两家书店均为平襟亚自设,虽店名不同,实皆平氏自印本。因此,吴氏所记陈巨来携赠之《书法大成》,应是万象图书馆初印本。

第三段考释吴中方言,分别释字萎、释鼈、释疰、释痞。其文第一条云:

吴人以米爆之如破椒,叫卖于市,小

儿食之不伤饱,名之曰字萎,盖此物无可名,乃以爆时发声,如字名之耳。《周礼》籩人,其实體蕡先。郑注云:熬麦曰體。康成云:今河间以北煮種麦卖之曰逢。《荀子·富国篇》“拔體”下注引二郑说。郝懿行曰:熬,干煎也。今谓之燻。逢,当音蓬,谓蓬蓬然张起。今江南人蒸稷米曝干燻之,呼米逢。与郑义合,知逢古音如蓬也。愈按:《苏州府志·风俗门》爆糯谷于釜中,名字萎,亦曰米花。米蓬当即米花,蓬与字皆爆声。蓬、字又一声之转。吴俗名字萎,即郝说之米蓬,亦即康成之所谓逢。又即《周礼》之所谓體,所异者北人熬麦,南人爆米耳。蓬、字,爆声。郝云蓬蓬然张起,乃状物之形,二说皆可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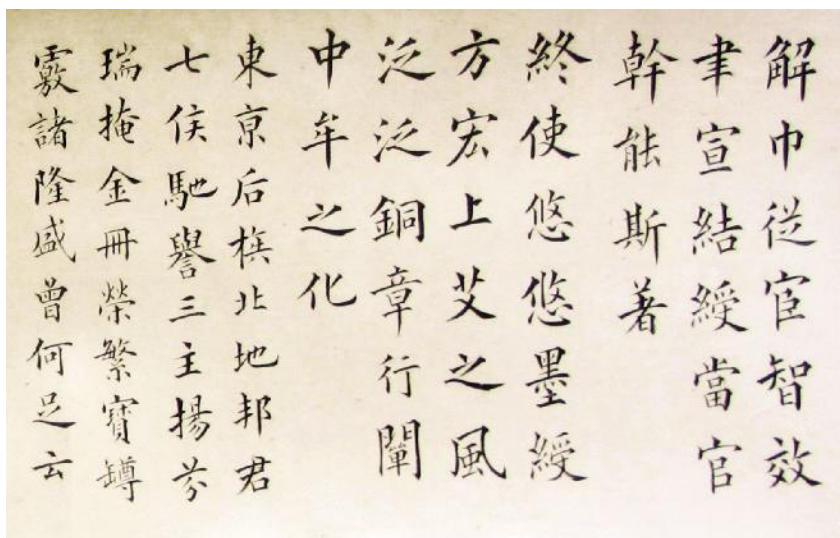
《府志》又云,人人皆自爆之,以卜一岁之休咎。按今星命家有谓卜流年者,则字萎亦可谓之卜流。

按:以上一条已收入《栩缘随笔》,“《府志》又云”一节为附注,缀于“亦曰米花”句下^[2]。正如叶景葵所说,王同愈除了掌故、书画、碑版之外,同时也热衷于对方言的考证,尤其对吴中方言最为留意。在《随笔》之中,相关考释夹杂于书画、碑帖之间,或长或短,参合古人成说,辩证时人新论,其中尤以《苏州府志》、郝懿行《证俗文》为多。四条之中,仅此条见于《栩缘随笔》,其余三条则无之。第二条云:

吴语木叶花瓣衰落曰鼈,发肤遗蛻曰鼈,读若妥,去声。世皆谓吴音率有声无字,乃以蛻、褪等字当之,义合音乖,沿用不察,而鼈之本字,转鲜知之者。《文选·江赋》产鼈积羽。注引《字书》曰:鼈,落毛也。鼈与鼈同音唾,与吴语音义并合。

第三条云:

《表异录》引《硯北杂志》云:今人不善乘船,谓之苦船,北人谓之苦车。苦音库,今江南人有蛀船、蛀轿之名,不闻谓之苦。



王同愈诗书卷(之四) 苏州博物馆藏

愈按：蛙当作疰，《元池说林》：立夏日啖李，令不疰夏。《姑苏志》：夏至以来粽之草系手足而祝之，名健糗，云以解疰夏之疾。《苏州府志》：妇女各插青梅子一颗于鬓边，免疰夏，即此疰字。疰夏、疰船，皆病嫌之词，引申之，凡所厌恶之人与事物，吴下皆谓之疰。而疰夏、疰船，沿为雅典，妇孺都能道之，与北人之名曰苦，各为其方言耳。

第四条云：

肤肉浮满曰肿，余戏谓贝赋琴曰：呼肿为海（平声），其字作何书？赋琴曰：医书但有肿字，此吴下宿音也，或有声无字耳。余谓不然，宜兴一带呼肿为虚，昆新一带呼为吼（平声），其音皆相近，则必有其字矣。按《字书》瘡，音哈，《唐韵》、《集韵》并呼来切，读作海，平声，即此字也。贝为之叹绝。

其中，孛娄一词收录于清人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卷六，徐复先生校议仅引《武陵旧事》、《常昭合志稿》两条^[1]，不及王氏所据各例。同样，鼯字也见于《吴下方言考》之“鼯毛”，一词中，《校议》引《方言》、《文选·江赋》李善注、《集韵》^[2]，则溢出王氏所论。至于其余两字，《吴下方言

考》亦有音义相近而字形不同者，可以与王氏所论对看。以上所述，结合《栩缘随笔》中考释相关记录，从一个侧面可见王同愈在小学方面的功力。

第四段据叶景葵所称，为“临唐碑三种，均未详”。三种文字分别如下：

解中从宦，智效聿宣，结綬当官，干能斯著。

终使悠悠墨綬，方

宏上艾之风；泛泛铜章，行闡中牟之化。

东京后族，北地邦君。七侯驰誉，三主扬芬。瑞掩金册，荣繁宝樽。核诸隆盛，曾何足云。

按：所谓未详的三段文字，其实并非如叶氏所言的唐碑三种，而是出于同一块唐碑——《梁师亮墓志》，即《大周故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并序），全文载《全唐文》卷九九四。此碑刻于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今藏陕西碑林，已裂成多块，现仅残存五块，文字泐损近半。王氏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十四日以二千钱买得《梁师亮墓志铭》^[3]，越二年（1897）六月初十以五两五钱购旧拓《梁师亮墓志》未残本^[4]，此卷中所装，应该是其中不相连贯的三部分志文，所以叶景葵才会产生误会。

第五段为题张茶农石公山画卷七绝六首之三，王氏误写作“山公石卷”，附记云：“浩臣女倩见而好之，时将回苏，即以赠耳。宣统三年三月书于南昌官舍，栩缘老人。”按：张深（1781—1843），字叔渊，号茶农。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张崑之子。嘉庆十五年（1810）解元，官至广东潮阳知县，卒于任。著有《昨悔斋诗录》四卷。原卷系顾肇熙携示，据王氏《栩缘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二十九日记：

铜井携示王蓬心临北苑《潇湘图》卷、张茶农解元《石公山》卷。王卷系赠梦楼太史者，梦楼有长题，可称二王合璧。卷尾常熟师有七古一首。^[17]

又次年(1896)十月十九日记云：

为铜井题《石公山图》卷。图为张茶农解元临石谷本。为书小诗六首：

虞山法乳付谁论，挽底云烟欲吐吞。
万顷湖光濯毫素，几家笔墨梦槐根。

细雨春帆忆旧游，恍疑仙侣此同舟。
不须探秘龙威去，身后居然等白鹤。

古木槎枒拥碧巉，洞天大字峭崖嵌。
金庭玉柱无消息，未许游人到隔凡。

……^[18]

此卷所录，即此前三首。按：王氏《栩缘日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初三日记：“是日命寅儿带女倩浩臣望新亲。”^[19]然则，王同愈之女王怀琬与顾瀚昌成婚，当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然而很不幸，王怀琬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1903年3月4日)生下独子顾翼东，未数日即病故。《栩缘日记》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云，王同愈于“薄暮，接惠臣侄来信，悉宝云女产后十八日去世。痛极如剜心膈，尚疑误传，须家信方确。”次日又“接浩臣婿信，云儿果去，伤痛曷已。晚与稷相对大恸”^[20]，三十日遂将其女诗手书十通，以托哀思，并作长信安慰顾瀚昌。随后所作《哭长女怀琬》，其妻蒋寿贞和之^[21]，足见王氏夫妇爱女之心。

数月之后，王同愈于五月二日回苏，六月二十八日“偕内子、寅、卯两儿、顾婿浩臣，泛舟至虎阜吉公祠纳凉，复移舟至留园啜茗”^[22]，此后亦不时过顾家，省视女婿、外孙，可见其女虽逝，他对女婿顾瀚昌并未另眼看待。宣统三年(1911)三月作此卷时，距女儿去世已逾八载，

仍以此相赠为念，则翁婿两人亲洽如是。

综上所述，顾翼东先生旧藏《王同愈诗文书卷》，集书画品评、书学论定、碑拓临摹、吴语考释为一体，内容与《栩缘随笔》相似，而多以砖塔铭笔法出之，并可窥见王同愈对女儿怀琬早逝之伤感，对女婿顾瀚昌之爱护。斯人已去，此卷历经百年，浩劫未隳。长长一卷砖塔铭，仿佛百年的相思，常留于天壤之间。

(作者单位：苏州博物馆)

注释：

[1] 刘红娟《归庄遗墨〈墨竹诗翰卷〉述考》，《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2]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25-530页。

[3] 同上，第322页。

[4] 西泠拍卖2012年秋拍古籍善本专场53号拍品。

[5]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页。

[6] 同上，第499-500页。

[7] 同上，第244-245页。

[8] 同上，第259页。

[9] 同上，第501页。

[10] 同上，第540页。

[11]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

[12] 同上，第544页。

[13] 徐复《吴下方言考校议》，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97-98页。

[14] 同上，第85页。

[15]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166页。

[16] 同上，第243页。

[17] 同上，第191页。

[18] 同上，第201-202页。

[19] 同上，第383页。

[20] 同上，第425页。

[21] 同上，第113页。

[22] 同上，第428页。

读《味水轩日记校注》札记

□ 陆平泉

屠友祥先生的《味水轩日记校注》(远东出版社,1996年初版,2011年再版),校与注都极其用心,自出版以来,已被学界广泛利用,影响很大。但仔细读后,发现尚有一些标点和注释小有疏漏,虽为小疵,却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略举数例,以供参考。

一、标点错误

1. 书中有些地方可点可不点,不能算错。但有些地方则必须点断,否则容易引起误解,如卷一“六月五日”记:

客持赵子昂《黄庭换鹅》图卷来质钱,……后缀宋拓《黄庭》一张,子昂临本一张。跋云:余内人得古拓《黄庭经》,请余作图,又自临一过,江陵黄琳美之家物也。有张伯雨题字。(第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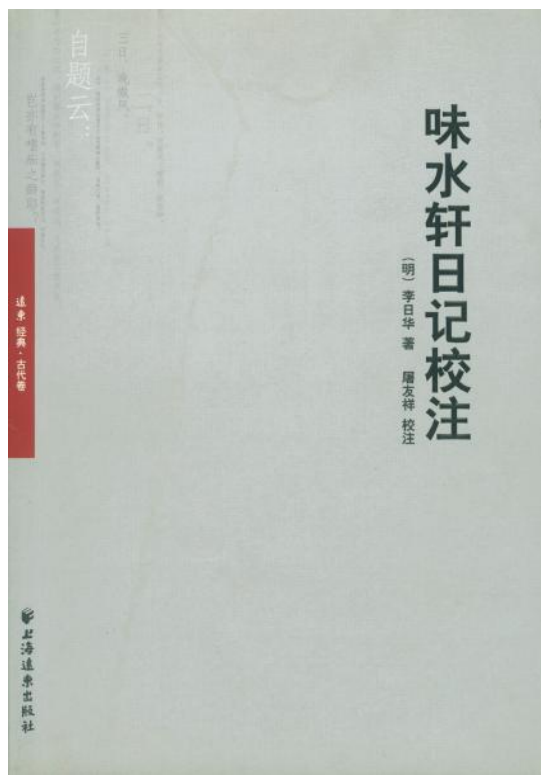
此处于“跋云”后未加引号,而在“江陵黄琳美之家物也”后断。按黄琳(美之)是明代中期收

藏家,《开有益斋读书志》:“金陵收藏家徐霖髯仙、黄琳蕴真、罗凤印冈、谢少南与槐,并著于时。”今故宫博物院所藏徐霖《花竹泉石图卷》上有黄琳题跋,落款“江表黄琳”,钤“美之”朱

文印。因此,此处“自临一过”后当作句号,而非逗号。若作逗号连下读,则“江陵黄琳美之家物也”亦为赵孟頫跋语。赵焉能知黄。因此,这段文字,宜于“余内人得古拓《黄庭经》,请余作图,又自临一过”加引号。

2. 不该加引号,而误加者,如卷二“正月十九日”观王蒙《双松钓艇图》,有郑明德题云:“何郎酷似舅,北上何时归。森然五色笔,终当补衮衣。不应画松并画石,时如其舅作戏剧。”后有李日华考订语:

余细阅画法,又以三诗参之,非叔明笔也。老铁题字作篆太恭谨,可疑。叔明楷



《味水轩日记校注》书影

法亦纤弱不类。遂昌首题云：“何郎画松石，乃是元时一何姓人之笔，亦系郑氏之甥，故云然耳。”余皆后人强缀之以博时价，然此品本亦不恶也。（第 80 页）

按此段文字，惟“何郎画松石”一句可加引号，而不应延至“故云然耳”后。这里之所以标点错误，是因为没有弄清郑明德是谁。郑明德即元代郑元祐（1292—1364），字明德，处州遂昌人，世人称遂昌先生。因此李日华考语中说“遂昌首题云‘何郎画松石’”，其实就是指前面郑明德所题诗，其余则都是李日华的考语。李说甚是，此图乃郑明德之何姓外甥所作，而非王蒙笔。之所以题作王蒙，当是后人因郑诗“何郎酷似舅”句，而附会王蒙与赵孟頫的甥舅关系。（前人多误以王蒙为赵孟頫外甥，实为外孙。）

3. 本不该点断，却点断，易生歧义，如卷一“十一月十日”记右军书嵇康《绝交书》云：

殊不知卷尾“湘东所进”等十一字，是梁武笔。况梁武内府所藏，皆有朱异。唐怀充辈押尾后，天监下押云字，乃萧子云，亦非范云。（第 60 页）

这里“皆有朱异”，不可解。其实“朱异”后不当作句号，“朱异”是人名，《梁书》有传：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唐人也。……据权要三十余年，……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鹵簿，近代未之有也。（第 537—540 页）

朱异在梁武时，因“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后来的侯景之乱，即“以讨异为名”。以朱异之受宠于梁武，又有才，宜其“梁武内府所藏，皆有朱异、唐怀充辈押尾”。唐怀充亦梁武时善鉴者，今王羲之《何如帖》后犹有其押署。因此“朱异”后当作顿号，而非句号。又“押尾后”之“后”字，似宜连下读。

以上仅就书中不易为读者所察觉的标点错误，略举数例。

二、注释错误

此书注释甚详，极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但偶有失误，姑举一例，如卷五“九月二十二日”：

购得沈石田擘窠书一长幅。规模双井，诗所自作，亦惕然醒人……（第 371 页）

注释“双井”：

明书家吴宽，号匏庵，又号双井村人。（第 37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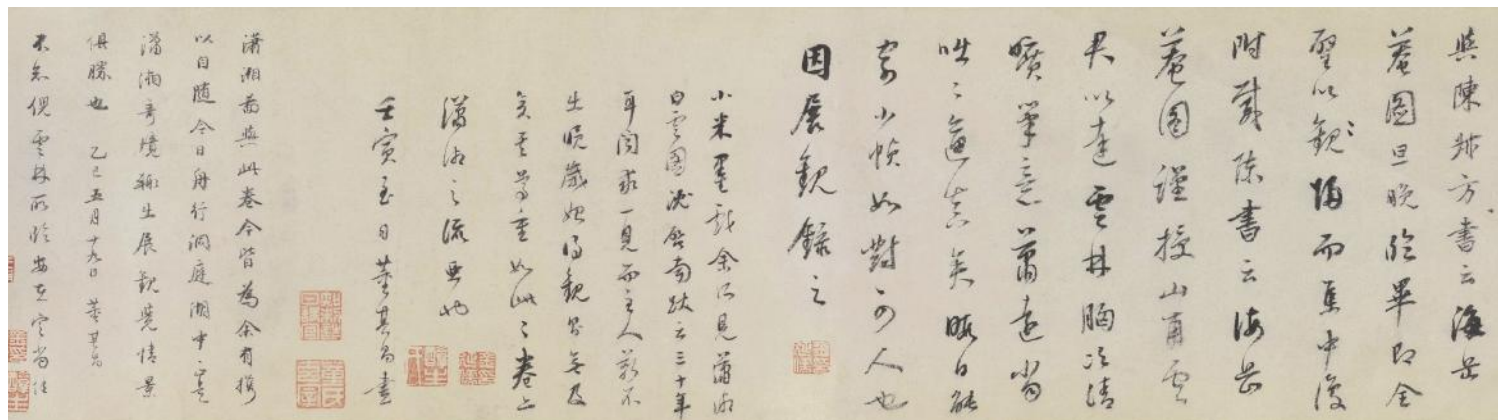
按此双井其实是“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双井村人。因以“双井”自称，如《山谷题跋》卷八“石门寺题名”条云：“韩城元聿、双井黄某，同游石门。”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四：

沈石翁长卷，写南屏诸山，淋漓欲滴，逼真梅沙弥也。用黄双井法大书一诗，亦雄岸有气。（第 75 页）

“黄双井”即黄庭坚。可见李日华是很喜欢以“双井”称黄庭坚的。又沈周与吴宽为好友，但两人书法的取法不同，沈周书法黄庭坚，而吴宽则师法东坡。

三、关于参校资料

关于此书点校所据，屠友祥先生于书前“小引”中称，“以嘉业堂丛书本为底本，参校以啸园丛书本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李日华于味水轩中赏鉴书画，往往在《日记》中从容录其跋语，不厌其烦。而其中所著录的大量作品今日尚存，应该是最好的参校资料。屠友祥先生未能据存世之原作细校，因此难免失误，姑举一例，如卷八万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记米友仁《海岳庵图》（今藏故宫博物院），李日华于卷后米友仁、薛羲、贡师泰、刘中守、邓宇志、吴瓠硕等各家题跋一一抄录。但与原作细校，发现略有出入，如米友仁题，纸质甚疲，且已残损，因此有不少字缺失或无法辨认，李日华也往往臆测。而薛羲题跋，则于



董其昌题米友仁海岳庵图

“先居润州”之间脱略“太原，后徙襄阳，过”一行。另吴瓠硕题跋的位置也与今天所见不同。屠友祥先生因未见原作，不知其详，标点时易于失误，如“米家父子最风流，点染毫端满纸秋。海岳庵前天欲曙，瓜洲渡口望沧洲。吴瓠硕晋安曾环敬观。”误将曾环的观款联缀在吴瓠硕名后。而后段董其昌题跋则更是令人莫名其妙：

余家藏倪迂遗集，有与陈叔方书云：“《海岳庵图》，旦晚临毕即见归。”而集中亦附载陈书云：“《海岳庵图》，谨授山甫卢君以达。云林胸次清旷，笔意萧远，当咄咄逼真矣。暇日能寄小帧，如对可人也。因展观录之。”小米墨戏，余所见《潇湘白云图》。沈启南跋云：“三十年耳闻，求一见而主人靳不出，晚岁始得观，则无益矣。其尊重之如此。二卷亦《潇湘》之流也。”“《潇湘图》与此卷，今皆归余有，携以自随。今日舟行洞庭湖中，正是潇湘奇境，辄出展观，觉情景俱胜。乙巳五月十九日，董其昌。”（第585页）

屠友祥先生标点如此。“余家藏倪迂遗集”云云，让人以为是李日华语，其实都是董其昌题

跋（凡三题），照前体例，当于此段文字加引号。兹将原题录于后，以供读者参观，亦可见文字异同之一斑：

“余家藏倪迂遗集，有与陈叔方书云：‘《海岳庵图》，旦晚临毕即全璧以归。’而集中复附载陈书云：‘《海岳庵图》，谨授山甫卢君以达。云林胸次清旷，笔意萧远，当咄咄逼真矣。暇日能寄小帧，如对可人也。因展观录之。’”“小米墨戏，余所见《潇湘白云图》。沈启南跋云：‘三十年耳闻，求一见而主人靳不出，晚岁始得观，则无益矣。’其尊重如此。此卷亦《潇湘》之流亚也。壬寅至日，董其昌书。”“《潇湘图》与此卷，今皆为余有，携以自随。今日舟行洞庭湖中，正是潇湘奇境，辄出展观，觉情景俱胜也。乙巳五月十九日，董其昌。不知倪云林所临安在，定当佳。”

点校像《味水轩日记》这样以著录书画为主的日记随笔，似还应充分利用存世的书画作品，作为参校的主要材料。当然这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但不用此等资料，总难免隔了一层。

（作者单位：昆仑堂美术馆）

方还撰书的《巴城福星桥记》

□ 郭志昌

方还先生于1928年6月撰书的《巴城福星桥记》，由无锡杨中孚镌刻。原碑已被毁弃，所幸1949年以前出版的《进修莲社》一书中还保留着此碑的照片。

纵贯巴城镇南北的常熟塘（今称张家港）上有两座桥梁，南面的叫文星桥，北面的叫福星桥。文星桥原来是没有的，清道咸年间曾议建之，既尔以费弗给，筑基中止。三十馀年后，于1887年春重新上马，终成于次年秋。王德森有记。福星桥原来是有，只是木柱板梁，经年累月，不堪风摧雨毁，终至倾圮。乡人患苦，乃创议改建石桥。热心者登高一呼，应者影从，1924年开工建设，22个月即告完成。桥已竣工，余钱尚多，主事者又拿来用了3年的时间扩建了仁济石桥。主事者请方还撰写建桥碑记和对联，方还乐而为之。后由无锡杨中孚镌刻成碑立于桥头。

碑文如下：

巴城福星桥记

距城西北二十余里，湖荡滢漾，环湖村落，远近数十，旦晚上巴城舟楫成市，市长里许，南北往还，中通市港，徒行有梁，南曰文星，北曰福星，咸资利涉，而福星木柱板梁，燥湿耗蠹，江轮激湍，更岁倾圮，

乡人患苦，乃创议易石。朱君慕丹，施君杏如，朱君渭声，力勉其言，四出募款，张君节之，身为之先，慨输白金三百，应者毕集，输数逾万，飭才庀工，经始于甲子九月，越二年丙寅七月告成，工巨众劳，既坚既圉，用核金赢乃扩建仁济石桥，爰始于丁卯二月，成于戊辰三月，都凡费一万二千五百元，涂者载歌，市者载怵，百世之利，五年而竣，慕义脍仁，人人从同，民治以实，不

以名不责，诸公而各斥财为之，上以补王政之阙，下以弥乡人之憾，可风也，来征记言，书告公众其款。项出



方还撰书巴城福星桥记



方还撰写的两幅桥联中的半幅

纳专册刊布，任事诸君详之碑阴。是役也，慕丹为尤力云。民国十七年戊辰六月，昆山方还撰书。

方还写的桥联是楷体：“南达市河鱼稻熟时乡社集，北通后港雁芦深处野航来”。上联有“民国十五年丙寅三月”字样，可见碑文和对联不是作于同一个时间。

随着城市建设和改造的大规模进行，福星桥先是易地重建，后又被彻底拆掉了。至于《巴城福星桥碑记》更是无处可觅。现在巴城老镇仅保存着刻有上联的楹联石的实物原件，而下联却无处寻觅。有的话，落款处应有方还的名字和印章。

人们普遍认为，方还先生的书法，主要得之于颜真卿的法乳，而更具轻灵圆转，随意洒脱，且不失沉稳与骨力的特点。后人评其“书法颜真卿，略变其体而有自己面目，古拙绝伦”。这篇碑文，字的结体跌宕恣肆，但不露斧凿之痕，藏巧寓拙。方还有意返璞归真，看来还真达到了目的。

方还先生1932年4月去世以后，他的遗墨成了人们所喜爱的珍宝，而这一块碑刻的意义在于，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方还所有书法作品中罕见的一件接近隶书的作品，颇具汉隶神韵，魏碑气度，力足丰润，刚柔并济，实属上佳之作。

（作者单位：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

《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作者之证

□ 申 闻

李玉棻字韵湖（一作均湖），清末北通州人，所著《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多记友生收藏法书名画，素无疑问。民国间，吴中江氏文学山房据抄本排印为《迟鸿轩所见书画录》，托名杨岷（1819—1896，浙江归安人），内容全同，次序小异，遂生真伪之案。自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先后辨之，今人张小庄客岁曾作《迟鸿轩所见书画录真伪考》反复考订，而皆未以书中内证自白。按：《过目考》卷四“张祥河”条称其为“张照从孙，董诰弟子，玉棻之外舅也。嘉庆庚辰进士，官工部尚书，谥温和”，可知作者自称“玉棻”，为张祥河女婿；同卷记堂兄名“李庆良字赉卿，号友鹤”，则作者同姓“李”，其证一也。又，《过目考》附录

“樊镇”条称“顺天通州人，主白马庙。书法承旨，工花果竹兰。精炼术，年逾九十，童颜鹤发，纵谈无倦。……余与其同里，幼时尚亲见之。尝以自选佳颖见贻”，显然作者籍贯为北通州，其证二；再，“樊镇”条续云“余藏有花果博古大横幅，画于道光庚戌秋日，后余生之一岁也”，则作者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视杨岷晚三十年，其证三。姓名、籍贯、生年，伪作《迟鸿轩所见书画录》者皆袭而未改，痕迹宛然，然则托名杨氏之贻，实不足辨。《中国书画全书》将此真伪二本收入一册，不免失当。另，李玉棻有“均湖庚子后收”、“通州李玉棻韵湖庚子后所收书画”诸印，可见卒年必在1900年以后。